



钱 俊 瑞

# 世界经济 与 中国经济

人 民 出 版 社



# 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

钱 俊 瑞

人 民 出 版 社



## 目 录

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世界经济科研规划 .....	1
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而奋斗 .....	15
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向世界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	34
认真研究世界经济,促进我国四化建设 .....	48
按照科研规律,搞好世界经济研究 .....	57
评劫贫济富中的“里根衰退” .....	65
展望和探索的国际盛会 .....	71
国际讨论的丰硕成果 .....	74
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	85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 .....	94
80年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	114
——1982年11月24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演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	131
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性问题 .....	136
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	152
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不变 .....	163
认真改进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	173
当好全国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先驱 .....	181
略谈实行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 .....	190
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大搞社会主义 .....	194



## 进一步解放思想， 落实世界经济科研规划

——1979年7月20日在全国世界经济  
学科规划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今天，在全国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即将胜利闭幕的时候，我还想着重讲一下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然后，就与《规划》执行有关的几个问题，讲几点看法。

我之所以要着重讲讲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与进步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批了多少年的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把许多人关的关，赶的赶，使世界经济研究领域成为一个重灾区。对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状况的这种估计，使我们不能不把解放思想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和提到战略的高度上来，认真地加以考虑和解决。经过这两年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解放思想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打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设置的各种框框和“禁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的新现象、新问题，寻求其规律性，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理论，有效地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那么，当前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有哪些问题还在阻碍我们思想的解放呢？我认为，这样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估计问题。列宁曾经讲过,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将会立即或者很快死亡呢?根据列宁逝世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实际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确实进入了老年时期,确实在走向死亡,并且归根结底是定然要死亡的。但是,它在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却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有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比如奴隶社会有奴隶和奴隶主,封建社会有农奴(或封建农民)与封建主,资本主义社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都在实践中间,在互相斗争中间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统治阶级统治的经验在增长,被统治阶级反抗的经验也在增长。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从镇压奴隶的起义里,增加了统治的经验,奴隶则从和奴隶主的斗争中增长了才干。奴隶社会是如此,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阶级剥削社会,统治阶级总是随着自己的老化,从最初的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变成一种落后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一方面,它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愚蠢;另一方面却变得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狡猾。被统治阶级则一方面越来越受压迫,另一方面越来越觉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目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虽然已经进入了老年和垂死阶段,但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一定时期,有过并且还会有较快较大的发展。这一点,列宁本来已经预见到了,后来却被斯大林否定了。在这点上,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起有落,封建社会何尝不是这样。比方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就曾有过几次大起大落。秦皇朝最初生气勃勃,到后期就不行了。刘邦当了皇帝,他凭着自己的经验,特别从陈胜、吴广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实行了让步政策,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安定了社会秩序,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汉朝以后,魏、晋、南北朝越来越没落。到隋、唐,又使封建社会得到发展



和巩固。特别是唐朝，从农民运动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让点步，局部的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唐朝以后，到宋朝，经过南宋，又趋向没落。朱元璋本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建立了明朝，也局部的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又强盛起来了。从中国封建社会几起几落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也并不是那么愚蠢的，它会向被统治阶级学习，会在基本上确保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调整封建生产关系，调整上层建筑，使生产力恢复并有所发展。

资本主义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起落很多、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立。随后，发生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产阶级着慌了。什么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政策呀，罗斯福的新政呀，直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应运而生，目的都是想挽救资本主义的生命。其中有些措施也确实发生过一点作用。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缓过气来。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邦也搞起社会主义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使国际资产阶级吓坏了。经过一阵慌乱，国际资产阶级又变得聪明一些。他们更多地不是采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方法，而是采取社会民主党的、工党的改良主义，搞国家资本主义。你们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我也搞“计划经济”。按照我们传统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就一个企业而言，是有计划的，但整个社会是无计划的，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后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变得更加周密；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下，垄断资本力图使社会生产带有一定程度的计划性。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社会主义学来的。你搞计划，我也搞计划；你讲改善群众生活，我就搞福利主义，搞



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物价上升了，工资也提高了，当然，这也是工人斗争的成果。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鼓吹经济民主，工人参加管理。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厂的工人可以参加管理。丰田的厂长、经理们逢年过节还拜访工人家庭。他们让工人买股票，说你也是丰田的主人，丰田是你们的，你们要永远当“丰田人”，使工人为当“丰田人”而感到自豪，好永远保护这个厂，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你们看，资产阶级不是越老越有经验了吗？今年2月我到瑞士去开会，看到瑞士的所得税达到80—90%。西欧不少国家失业保险基金很高，有的国家失业工人第一年最高可以得原工资的90%，第二年拿80%，第三年拿70%。所以，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确实处于低潮时期，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一套、改良主义那一套搞得很厉害，欺骗性很大。我们在日内瓦参观时，看到瑞士联邦议会两院开会，除议员席外，还有记者席，外交使节席，还有群众席，群众可以自由列席旁听。在联邦大厦，在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门口没有一个警察，群众可以随意进出。谁都可以列席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当然，他们这种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假民主，是一种带欺骗性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但是，他们却在十分认真地实行这种欺骗，相当有效地使群众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说，国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老练、狡猾，他们还拥有强大的生产力，特别是支配着现代科学技术这个强大的生产力。他们确实老了，但还可以吃点补药，还可以延长点寿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就是这样的补药。这套东西有两重性，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延长寿命，另一方面，使它更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资本主义是终究要灭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不能把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理解得那么机械和死板，不顾客观实际，肯



定它很快就会灭亡。老的资产阶级在挣扎，各种类型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产生。现在看来，在短期内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激烈、最彻底的革命，它要消灭的是整个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因此，也是一场最艰巨的革命。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仅仅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尚且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无产阶级要在世界范围内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必须作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还要和国际资产阶级打很长时期的交道。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只有 62 年的历史。比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来，可以说，社会主义还处于幼年或少年时期，初创时期，或者说，还处在探索道路的时期。我们前程远大，但空白和未知数还极多。“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sup>①</sup>，斯大林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并且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方法，走不同的具体道路，尽管它们在本质上和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列宁、斯大林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14 个国家一下子打了进去。其后不断受到封锁、破坏和威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又向它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那么集中，那么优先搞重工业、搞军事工业，究竟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们要结合它的具体历史条件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我们新中国是打出来的，我们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的经验，但建国初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办法，只能学苏

<sup>①</sup>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译本，第 122 页。





联。最初我们几乎是一切照搬。果然有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问题，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不适当，中央集中得太多了。毛主席总结了这一段的经验，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两条腿走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我们的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30多年来，南斯拉夫根据自己的国情，摸出了一条搞社会主义的新路，叫做工人自治或社会主义自治。它最基本的特点是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而是由少数领导人作主，这些领导人甚至享受种种特权，由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南斯拉夫叫作社会所有制）就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至少是不完全的，或者很不完全的公有制。整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会带上大量旧社会的残余。这样，社会主义就一定搞不好。这恐怕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探索。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党中央强调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因。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据我个人看，总的说，目前是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左”就是我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那个“右”就是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在保持封建制，甚至奴隶制，实际上还在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中间派是大多数，他们当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的正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有的正在搞国有化，有的则正在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有的则正在逐步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所有这些国家，一般说来，都面临着超级大国和新老殖民主义者，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威胁。他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成为目前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主力军。他们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大的进步力量，但同时它们主要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后备军。我们说，在世界



范围内生长着新生的资本主义，主要就是指的这部分力量。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其中多数是可靠的同盟军。在反霸斗争中，要贯彻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同他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我们和他们生死与共，互相支援。同时，他们有许多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在解放思想方面，我们都要努力学习马、恩、列、斯、毛那种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革命勇气。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总是最敢于根据客观存在的实际，创立、革新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和原理的。他们决不拘泥于自己原有的个别结论，哪怕是重要的结论。他们总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和变化去改变那些不适合当前情况的旧命题、旧结论。1870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举行起义，那将是愚蠢的。但到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发动后，马克思给予了坚决而热烈的支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得出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结论，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恩格斯原来讲是5年，后来根据新的情况，说周期是10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新理论，并在一个封建落后的帝国主义俄国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斯大林根据沙俄帝国和当时欧洲的实际，直截了当地指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有片面性的缺点，它“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会混淆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区别，会使以后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成为不可能。马、恩、列、斯都主张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革命的成功。到了中国，毛泽



东同志讲,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批评了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这些就叫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勇气和革命胆略。我们要学习革命导师们的这种勇气和胆略去冲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设置的种种“禁区”。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但是,对于马、恩、列、斯、毛讲过的话,凡是不适合已经改变了的情况的一些论点,甚至有的重要论点,也应当大胆抛弃。这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一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作为我们的光辉榜样,创造性地去研究新现象和新问题,敢想敢闯,去攀登世界经济学科的高峰,切实、有效、具有远见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必须坚持中央提出的“三不主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在学术问题上,我们不仅容许而且应该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派,坚决反对压制不同意见和压制“小人物”的学阀,坚决反对“一言堂”。真理越辩越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我们现在承担的科研课题,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也不必强求一致。我们可以就一个问题写出学术观点不同的几本书来。目前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一种学术争论的空气,而没有热烈的学术争论的气氛,世界经济的研究要走向繁荣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说的解放思想,实质上指的是摆脱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首先是“左”的指导思想以及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转到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上来。这要求我们对内坚持“四项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是“四个坚持”的核心和基础)；对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反霸统一战线，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争取国际和平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义不容辞的历史性责任。

现在，我再讲几个和执行“规划”有关的其他问题。

**首先，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应当说，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要很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必须十分注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这是使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兴旺发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理论来源于实际，反过来又对实际起着指导的作用。因此，只有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世界经济的历史实际和当前实际，特别是研究世界经济现实中提出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世界经济的理论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否则我们的理论便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如果连外国现实中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这样的理论又如何能够拿来指导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际呢？当然，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研究单位比较侧重于长期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机关和人员，比较侧重于完成短期的研究任务。但是，无论前者和后者，都要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都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问题。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要结合起来，大搞调查研究，从而提出双方同意的方案来，作为决策的依据。这是一件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事，是我党历史上的空前盛举。在我们这次会议上，马洪同志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布置的调研任务给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出了10个题目，汪道涵同志出了37个题目。对此大家纷纷报名承担。有的组在讨论时，不但



落实了长期规划，还主动地提出和落实了中间性产品，例如准备在近期和中期内完成的论文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说明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从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全体同志要紧张地动员起来，投入这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踊跃承担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交办的调研课题。特别要有选择地研究若干外国（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与现有企业改造的关系等方面的经验，争取在今后半年内分两批，写出一些较有份量的调研成果，努力争取成为党和国家制订经济政策的助手，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作出贡献。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力争在学风方面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坚决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不正之风，使我们的科研工作有一个大的提高。在这里我代表广大研究工作者恳切请求实际工作部门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创造必要的联系实际的条件，尽可能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方便。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甚至忽略世界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了。长期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短期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之间是一种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关系。离开了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世界经济的基本理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离开了世界经济的基本理论，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可能深透的。我们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第二，要大力加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

从我们这次《规划》的机构设置和世界经济研究队伍的状况来看，对三个世界的研究，在力量的配置方面是很不平衡的。其中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最为薄弱。从地区来讲，对中东和非



洲这个两霸激烈争夺的地区,以及对拉丁美洲的研究更为薄弱。世界经济是一个各个部分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由于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缺乏研究,必然要影响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和特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以及关于跨国公司等问题的研究。在这次《规划》会议之后,希望各地的同志们都来注意加强亚非拉地区经济的研究,注意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增设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世界市场问题、国际金融货币问题以及世界能源问题、世界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等世界经济领域内综合问题的研究。

### **第三,关于团结各方人士,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无论和四个现代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还是和完成《规划》任务的需要相比,目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人数都是十分不够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培养和扩大世界经济的研究队伍。我们的世界经济研究机构要强调精干的方针,力求培养骨干力量。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我们必须十分强调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我们的队伍内部必须增强团结,加强交流,反对各种各样的互相封锁的倾向。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成立了全国世界经济学会筹备小组,希望能够迅速地开展工作,使全国的世界经济学会能够早日成立。这对于我们加强交流,增加了解,对于把世界经济研究队伍中的三个方面军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注意调动社会上在世界经济或外语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各种人员的积极性。可以采取特约研究员、特约翻译等办法,把他们吸收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来。我建议,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具备上述条件,都可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我们的学会,不受任何资格的限制。在那些虽然并不



以世界经济的研究为职业，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中间，往往可以发现未来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出一批 40 岁左右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骨干队伍，我们也要善于发现人才，包括现在还分散在社会上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各种有用之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很多是世界经济研究战线上的老将。希望他们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多作贡献，多出力量，造福子孙后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 第四，关于加强图书资料工作的问题。

为了加强图书资料工作，《规划》主要提出了四方面的措施：一是重视图书资料人员的培养工作，规定到 1985 年，图书资料人员应增加到与研究人员成一与三之比，其中图书馆系的毕业生应占相当的比例。二是重视图书资料人员的考核和提升，规定这种考核和提升应当“按照与研究人员相当的标准”进行。三是明确规定要尊重图书资料人员的劳动，并通过一定的培训措施，包括出国考察，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四是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加强图书资料工作，其中包括在北京等地建设世界经济的资料中心。

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加强图书资料工作，因为这是整个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不做好图书资料工作，怎么能做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呢？实际上，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我们每个研究人员都在程度不同地做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凡是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几乎都是做资料工作的里手。而图书资料人员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也需要熟悉资料，进行研究。随着资料工作水平的提高，资料工作中研究的因素将会增加。每个真正的研究人员，都应当关心资料工作，十分尊重图书资料人员的劳动，因为我们都



是同一条世界经济研究战线上的战友。轻视图书资料工作，认为图书资料人员低人一等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彻底克服。今后研究人员和图书资料人员可以适当交流。刚开始做研究工作的同志最好先做一段图书资料工作，练好这门基本功。希望大家都能够向有关领导大力宣传加强图书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相互交流资料，提高资料质量，使建立资料中心的工作能够较快地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决定建立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并将为此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条件。

同志们，30年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历来重视对外国问题的研究。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中，特别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外国。在此之前，毛主席早就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还没有经验，而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后，全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总的说来，那时我们在学习外国方面是有成效的。广大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为配合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阶级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1963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和亲切关怀下，成立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更为世界经济研究的组织建设打下了基础。

但是，从1966年后的十多年中，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和破坏，濒临夭折的境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解放。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揭开了广阔发展的前途。在我们面前虽然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它们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只要我们认真总结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实事求是，努力工作，我们世界经济研





究这条战线,将和其它战线一样,会发展得更快更好,这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确实大有可为,前程似锦。让我们积极地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大力搞上去,更好地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战吧!

(《世界经济》增刊,1979年第3期)



# 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经济学而奋斗

——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市委召开的  
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一、30年来我国世界经济 研究工作的基本估计

30年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建国后，最初17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和关怀下，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一片废墟上，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几乎白手起家地建立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其中包括研究世界经济的机构。1963年经中央批准，又增设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门机构，从组织上为建立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体系打下了基础。在这17年中，我们培养出了一批研究世界经济的有用人才，组成了我国世界经济研究的基本队伍。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已经成为我国世界经济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在这段时期中，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苏联的经验，以及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虽然也犯过片面性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正确原则。广大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必须予以肯定，并给以足够估



价的。

但是,正当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我们却遭到了林彪、江青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长达10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外部世界几乎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研究机构被解散,人员被下放,研究工作差不多完全停顿了,这使我们和国外研究水平的差距扩大了10—20年的时间。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得到了解放。3年来,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全体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比较顺利地走过了一个恢复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79年7月我们召开了世界经济学科的全国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规定把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作为今后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确定了一批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紧密的重点课题。我们的队伍正在扩大,一批新的研究机构正在有计划地设立。一个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科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些都说明,在我国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蓬勃发展的新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综观30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哪些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才能顺利地发展;而当反革命阴谋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横遭歪曲、篡改的时候,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就遭到破坏和摧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兴亡盛衰,广大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科学生命是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走兴旺发达的道路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继续深入地批判“左”的错误思想,揭批林彪、江青的



反革命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

第二，历史的经验还证明，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才能健康地发展。实际，只有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的实际，才是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我们只有从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出发，才能不断地去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探索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多年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设下了许多“禁区”和框框，我们只有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得出应有的结论，才能有效地、真正地冲破这些“禁区”和框框。如果我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那么，即使天天提倡打破“禁区”和框框，这些“禁区”和框框还是不会从人们头脑里完全消失的。我们说解放思想，就是说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林彪、江青的极左的反革命说教和蛊惑在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走上无产阶级的，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也就是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下，根据客观实际，而不是根据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看问题和办事情。这里，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关系。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内，认真宣传、解释和阐明党的现行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同时，我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客观的实践。对于研究工作讲来，更重要的是研究不断出现、变化和发展着的新情况，探索新问题，供领导制定和修改政策时参考，起助手和参谋的作用。其实，做一切宣传工作也只有实事求是，与客观实际密切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得到大的发展必须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50年代，我们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发展较快，和当时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关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问题的几次大范围内生动活泼的讨论，是直接有关的。为了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真理问题上的反映，它表现着无产阶级彻底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是最尊重客观真理，最服从客观真理，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只有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革命原则，才能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在世界经济领域，我们决不能搞一言堂。在学术问题上，任何领导人，任何权威人士，任何著名学者发表的任何意见，都要在“百家争鸣”的空气中，经受起群众的批评和辩论。在真理面前是没有什么特权的。在真理面前耍特权，恰恰说明真理不在自己手里，是害怕真理，害怕马克思主义的怯弱表现。天下从来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发展30年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我们必须在学术界造成一种敢于敞开思想，放手让不同学术观点展开大争大辩的争鸣局面。这种局面是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繁荣昌盛的标志。必须坚决防止那种一家独鸣、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第四，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在这个规划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30年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整体看，一个根本的弱点是，这种研究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体系。1956年我们曾经搞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学科的发展规划，其中也包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规划。可惜的是，这个规划并没有得到落实，以致我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注意不够。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将会大



大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建筑在对世界经济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学科建设本身反过来又会使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得到更加具体的理论指导，使这种研究更加系统化，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经过了30年的发展，目前，随着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特点是：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将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发展得更加迅速，逐步形成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进而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努力为实现“四化”，为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胜利地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

## 二、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实际

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么，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大致上可以用四句话来表示，这就是：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但目前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不同的道路和模式，并且出现了曲折和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呈现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组织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

先说资本主义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高速度增长的时期。但是，周期性危机还是不断发生，1974—1975年又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愈加严重。尽管



如此，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今后，估计还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停滞膨胀”（Stagflation）的局面。特别是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将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还将有所发展。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经济还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资产阶级还能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使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它表明资本主义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入口”了。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垄断资产阶级采取调节措施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就一个企业而言，是有计划的，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则是无政府状态。二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性越来越强了。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整个社会生产在某些方面也带有了一定的计划因素。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历来都受到市场不足的限制。针对这一点，资本家大搞扩军备战，搞“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通过发展公共福利事业来增加社会购买力，使市场得到一定的扩展。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发展，现在更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国际调节的形式。当然，这些措施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和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们确实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从而容许生产力继续有所发展。

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也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企图对生产关系作出某些调整。如吸收工人参加管理，让工人买股票，搞什么“共同决定”、“共同管理”。厂长、经理逢年过节



拜访工人家庭，甚至把工人生日的年月日用数据存入电子计算机，使工人在生日那天一上班，就能看到一份送给自己的礼品。这些无非是想欺骗和麻痹工人，使工人感到自己和资本家之间似乎已经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似乎工人也有点象是工厂的主人了，借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学到这一套，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学，特别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产阶级感到靠德国、日本那套法西斯统治方法不行了，还是搞改良主义、“福利社会”、“人民资本主义”等比较有效，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在向他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学习。你社会主义搞计划，我也搞计划；你讲提高人民生活，我就搞“福利社会”；你讲“两参一改三结合”，我就搞工人参加管理。日本人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尽说丰田、丰田，丰田是从你们那里（按指“鞍钢宪法”）学来的，你们却反过来学丰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确进入了老年时期，离自己的死亡和社会主义的大门越来越近了，但目前它还有能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些局部调整，如同老年人服些补药一样，保持一定的生命力。当然，这种改良一般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重工人劳动强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次，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纷纷取得了独立，走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这些国家按照经济制度，多数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一方面，他们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剥削和压迫，目前又都面临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威胁，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内在要求。他们除了需要巩固已经获得的政治独立外，都有一个争取经济独立的严峻任务。他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成为目前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重要方面军。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正在建设的还是资本主





义的经济，决不是苏联宣传的什么“非资本主义”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后备力量。帝国主义、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衰落，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在成长，这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新特点。

从世界范围看，资产阶级之所以还有力量，还因为，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国家里，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或被反革命集团篡夺了政权，就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目前苏联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放肆实行霸权主义，这种行径自然不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是增添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延长了帝国主义的寿命。苏联暗中破坏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就是一个证明。在我国，如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全部权力，中国就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总之，国际无产阶级一方面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这条铁的历史规律，树立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坚强信心。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在目前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把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解释为毫无发展的可能性，把垂死性解释为资本主义将很快死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走向死亡是一段相当长的曲折起伏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在走向死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说明，并且研究同国际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现在再来说社会主义的状况。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方面出了两件大坏事。一是苏联变成超级大国，实行霸权主义；二是中国出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沉痛教训，它们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声誉。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根源，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



这是一个多少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苏联外，世界上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采取了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和道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它是按重、轻、农的次序进行建设的。这是一种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进行的。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实行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自治，实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民主。他们比较重视市场经济，同时逐步注意计划调节。这又是一种模式。朝鲜、罗马尼亚等则又采取了或多或少不同的形式建设着社会主义。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不同模式，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吸取它们的长处，避免它们的短处，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现在是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两头”，一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以及朝鲜、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另一头指的是那些独立后仍然高度依附于外国，实际上继续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着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的生产关系，如非洲的某些国家。这两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都占少数。所谓“中间”，指的是广大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们占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这些国家一般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通过各种不同道路发展着独立的民族经济。他们对外资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它们逐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利用外资而在利用中加以限制，通过这种斗争促使民族经济发展、壮大。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有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是，它们在帝国主义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逐



步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同情和支持这个前途的实现。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还突出地表现在国际经济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相互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大大发展和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了扩大和深化。世界经济和经济组织采取了各种新的活动方法。主要如：

——跨国公司得到了空前发展，它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控制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据估计，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frac{1}{3}$ 、外贸额的 $\frac{1}{2}$ 左右控制在它们的手中。它们在国内的产值接近，有时还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总额。整个70年代，跨国公司都继续得到了发展。

——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得到广泛发展。现在除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互会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成立了十多个经济一体化体系和共同市场。

——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纷纷成立，在国际上展开广泛的活动。

——国际贸易、国际信贷、国际资金流转、国际科技交流和转让、国际劳动力转移等都得到了广泛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国际海运、国际航运、国际保险事业等等都有了迅速发展。

世界经济领域内的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要求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周密调查和深入研究，从中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就把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任务，迫切地提到了日程上来。世界经济学就是在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这个客观实体的发展、变化作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 三、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世界经济而努力奋斗

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萌芽状态和几个发展阶段，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包括商品和货币信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建立起来了。资本输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世界分裂成为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日益上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两个部分或两个体系之间既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一面。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给整个世界经济，其中包括世界市场，带来了新的因素、新的特点和新的性质，使它发生了局部的质的变化。在两大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步缩小，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程，也将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并不表现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完全消失了，瓦解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经济交流，证明仍然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而是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内部发生了局部的质的变化，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作用在日益扩大。

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客观存在，是一种特殊的事物。它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运动规律，它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简



单的总和，它的运动规律也不是各国国民经济运动规律的简单的延伸。因此，人们需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分析、研究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这门学科就是世界经济学。

那么，创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世界市场等问题，用专门的篇章展开系统的论述，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及其它著作中，都曾对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设想，政治经济学应当分成五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就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第五部分则是“世界市场和危机。”<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等问题的论述以及关于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经济的大量研究，为我们研究世界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他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问题等一系列著作，是我们研究帝国主义时期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世界经济的研究。他曾经多次亲自过问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提出研究课题。他在联共（布）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多次详细地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在理论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的阶段论，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和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等。现在看来，斯大林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很多是正确的。例如，当年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正确地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



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東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认为，在目前的世界，“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输出和输入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依赖他国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否认一个国家的独立性。这里，斯大林明确地指出，“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sup>①</sup> 这些观点对于苏联在30年代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无产阶级进行国际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创建世界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当然，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否认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这一论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实际上是否认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否认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发展经济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认为，两个世界市场之间是“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一年比一年增大”，而帝国主义市场则“一直在缩小”。当时的苏联学术界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在世界民主市场上“找到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一切”，因此无须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联系。这些都在实践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毛泽东同志对当代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丰富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理论，指出需要树立和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思想，指出了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系列有关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形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势,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为典型,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作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在经济学界,前人和我们同时代人也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为我们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瓦尔加。特别是在他的前期活动中,他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以瓦尔加等为代表的苏联经济学界对于世界经济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弱点。第一,长期以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战争和经济危机等有关问题展开的。对于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怎样能够更充分地为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则并不完全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不能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呢?对他们讲来一直是一个疑问。指导思想方面的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限制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第二,在研究战争和危机等有关问题时,主流是好的,但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一点估计不足。直到1961年,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瓦尔加还断言,“就大体上的可能性来说,可以预言:20世纪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的世纪。到这个世纪末,将根本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将剩下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残余。”认为“20世纪将作为资本主义灭亡的世纪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世纪而载入人类史册”,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势这种总的战略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与此有关的是,瓦尔加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是战争所造成的“暂时性原因”引起的(比如美国等国家由于机器设备在战时长期没有更新而在战后造成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而这种原因以后是“很难再重复”出现了。有的经济学家,如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库钦斯基则认为,战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仅仅是依靠军火生产、战争准备和国民经



挤军事化的办法来实现的”，实际上是根本否认了垄断资产阶级还可能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一定程度的调节。第三，苏联对世界经济的研究，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科学的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设，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热莱斯等对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问题曾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我国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也曾经对世界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它的研究对象等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这些都为我们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那么，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材料中，最早的是布哈林的一个说法。他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世界经济，即包含世界全体的生产关系及与这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有的同志则认为，交换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同意把交换关系列入我们的研究对象。有的同志认为，世界经济学不但应当研究生产关系，还应当研究生产力。有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总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还需要大家继续讨论和研究。马克思曾经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在着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总是很重视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发展，重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他十分重视经济政策。《资本论》第4卷是剩余价值学说史，就是讲意识形态。我们的初步意见认为，世界市场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经济的论述为基础，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分析、研究它





的发展过程,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便是我们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道,共同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任务。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总体,就当前来说,主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我们要研究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交换关系在内),兼及有关的上层建筑。我们的研究重点则放在生产关系上面。

世界经济科学体系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要不断完善。我们的初步意见是:首先,我们要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的形式和实质。第二,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的具体道路和形式,它的不同的动向(包括前进和后退、过渡和蜕变),同时要研究它同世界其它部分的经济关系。第三,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以及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第四,综观世界经济的总体,并且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可以预期,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立和成长将会促使两门新的经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一门是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它的任务是科学地、详尽周密地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比较的研究,分析它们的共性和差别,长处和缺点,以及发展方向和前途。另一门是比较发展经济学,它的任务是科学地、详尽周密地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比较和研究,分析它们的共性和差别,研究它们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阐明它们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且展望它们的前途。

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实际出发,世界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11个方面:

- (1)对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
- (2)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互相斗争和



互相依存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运动规律。

(3)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式的比较、研究。

(4)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包括长波论)、工人阶级贫困化、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5)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及其表现形态和规律性。

(6)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和国际资本组织(如跨国公司等)的运动形态和规律。

(7)经济一体化,区域性经济和集团经济的性质、发展趋势和影响。

(8)民族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及其发展方向。

(9)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10)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的斗争。

(11)有关各经济学派对世界经济的理论的研究和评价。

为了明确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有必要对它和其它有关学科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科学。世界经济学则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生产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1)世界经济学不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关系，因为那时还不存在世界经济这一整体。(2)世界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的各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要作更加具体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比较概括。政治经济学是世界经济学的基础，它为世界经济学提供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经济学有助于我们掌握世界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则又将反过来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其次是世界经济学和国别经济研究的关系问题。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各国经济简单的算术的总和。世界经济有自己独特的矛盾和独特的运动规律。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综合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从国别经济的角度是无法深入研究的。但研究世界经济又不能离开国别经济的研究，更不排除国别经济的研究。二者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世界经济学没有国别经济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就不能深入揭示世界经济生活的运动规律。同样，国别经济研究如果不以世界经济整体作为背景，不纳入世界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不以世界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法则为指导，也就不可能深刻揭示各国经济生活的本质。

第三，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和目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国际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是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重研究分析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国际金融等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制定许多模式。它的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宽广得多，它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当然，它也要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并把这种研究放在一种突出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目的同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根本不同，它是要揭示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律性。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我们应当重视它，认真地批判地研究它，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成分。

第四，世界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60年代的产物。它的研究对



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应当批判地吸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合理的成分。

最后，我简单地讲一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的方法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的时候，必须始终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要分析事物具体的内在的矛盾，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研究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防止僵化和片面性。我们决不能拘泥于若干现成的结论。没有创造也就没有科学，也就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为此，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这两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过程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详尽地占有材料，对这种材料进行改造，加以消化。也就是说，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抓住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此外，我们要认真吸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方法论（如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法）中的科学部分，为我所用。

同志们，在我国，一个宏伟的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中，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把为“四化”服务放在首位，同时也要更好地为国际阶级斗争和我国的外交工作服务。这就是我们创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目的。让我们在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起，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而共同奋斗吧！



# 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向世界 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1980年4月21日在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宣布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开幕。

建国以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今天，在80年代的第一春，在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情况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终于成立了。这是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经济研究领域里的一件大事。它体现了全国广大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及关心世界经济问题的人们的共同心愿。现在，我着重对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今后的发展问题，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有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一、三年来的回顾

建国后17年，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曾经逐步地建立了研究机构，作了大量的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了积极的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破坏，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濒于毁灭的境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



集团，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得到了解放。长达10年之久的停滞败坏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从那时起，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各级党委的指导下，广大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奋勇前进，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作，使世界经济研究战线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团结战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向世界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局面，已经开始形成。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三年多来我们究竟主要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第一，确定了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正确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中心任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经过世界经济学科的全国规划预备会议和全国规划会议的酝酿和讨论，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洋为中用，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同时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这样就确定了新时期世界经济研究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对于今后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思想建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多年设下的“禁区”和框框，还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思想，阻碍着我们前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真地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地批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推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在各次会议上，我们反复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逢人便谈“余悸”的情况



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的许多“禁区”已被打破了。大家正在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以便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2年来，我们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为成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三，在组织建设方面，我们调整和加强了世界经济的研究机构，扩大了研究队伍。3年来，原有的研究机构普遍地恢复和扩大了，还新建了一批综合性的世界经济研究机构。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将所属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扩建成世界经济研究所。同时，我们又新建、改建或扩建了一批以研究国别和地区经济、政治为中心的研究单位。其中包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筹建的中亚研究所，由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改建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由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扩建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等。我们还加强了对世界经济某些重要专业的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筹建了外国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银行筹建了国际金融研究所，外经部筹建了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筹建了侧重研究国际金融的世界经济研究室，大连外国语学院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充实了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体系。此外，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必须提到的，就是世界经济领域的各种研究会纷纷成立起来了。如朝鲜经济研究会，罗马尼亚经济研究会，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美国经济研究会，西欧经济研究会，日本经济研究会，大洋洲经济研究会，苏联经济研究会，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会，等等。正在筹建的还有外国财政研究会等。在上海已经成立了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这些研究单位和团体在国内举行了大量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书刊，进行了学术交流工作，和国外的有关学术团体开始建立联系。



所有这些都为建立全国性的世界经济学会在组织上作了较好的准备。

第四,在业务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对于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来说,这是第一个独立的长期规划。《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定了一批重点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方向。在全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3年来,我们获得了一批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据估计,我们共计写出了一千多篇有关世界经济的文章、资料和研究报告。其中仅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达300余篇。有的文章和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好评。

上述这一系列工作表明,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已经在新长征的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认为,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历史上新的一页已经揭开。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繁荣昌盛的时期,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 二、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广大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虽然已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和客观的需要相比,我们的工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党中央对于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寄托着殷切的期望。去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曾多次向我们作出指示,提出要求。形势喜人,形势也是逼人的。

根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





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需要认真地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问题。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总的说来，将继续朝着有利于我国和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将会持续增长和发展，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也会继续前进，它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会更加有力地发展。同时，80年代将是一个动荡危险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暗淡的。苏联霸权主义将进一步向外侵略和扩张。战争因素将进一步增长。阿富汗事件预示了，海湾和中东形势将更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使霸权主义更加孤立。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对80年代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显得更加重要了。在这种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展望。80年代，未来学在我国应当成为一门重要的科学。对于未来学，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科学方法，加以改造和发展。我们对于世界经济未来的预测，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资料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

(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首先需要研究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为我们的参考和借鉴。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还处在开始阶段，需要尽快地加以深化和提高。迄今，世界上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一种是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一种是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国、朝鲜、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条件，也



采取了多少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模式进行周密的科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些国家的做法本身，并且要把这种做法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加以研究。不仅要研究它们的具体做法，而且要研究它们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依据。为了把这种研究引向深入，还必须对这些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所谓“比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以及他们的理论依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他们共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优点和缺点，成功和失败的方面。这种研究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至今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还处在少年和摸索的时期，哪个国家都很难说已经有了一套完全成熟的经验。比较研究的第二个含义是，要对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进行认真的比较。这样做，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哪些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哪些则带有普遍的性质；哪些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哪些是主观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在这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分支学科——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这对于我国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对各个兄弟国家都将是有益的。

（三）要更加系统地调查研究外国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有三类国家的情况需要我们分别加以研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经验；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经验；三是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的经验。凡是现代化生产，不管它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总有其共同的特点和要求，可供我们借鉴。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时间不同和国际环境不同，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又总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决不能生搬硬套。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我们更要具体分析；哪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学习的；哪些不但不



能学习，还要加以批判和反对的。比如资本主义国家靠提高工人劳动强度，靠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积累它们实现现代化所需的资金，我们不但不能学习，而且要予以揭露和反对。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防止的。“借鉴”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人家的长处，二是避免人家出现过的缺点和短处，这两方面需要同样予以重视。搞现代化和做任何事情一样，道路总不是笔直的，但我们要尽量少走弯路。我们开始搞现代化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这是我们落后的表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坏的表现。因为它一则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外国经验的良好条件，二则表明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后起的国家所以能够超过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国家具有利用世界技术进步成果的有利条件。在总结和借鉴国外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方面，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要更多更好地研究和介绍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经验。我们还要把它们经验提高到理论和战略的高度加以总结，提供党和国家领导部门作战略决策时的参考。

（四）为了提高我们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质量，我们要大力加强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理论建设。我们要在为四化服务，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过程中，把对世界经济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来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为四化服务和学科建设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把这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有害的。



### 三、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

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终于形成了世界市场。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世界货币的运用和资本输出的扩大,逐步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那个时期的世界经济是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种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到十月革命胜利便宣告结束。接着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存的时期。这种两个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直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最终战胜并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进入统一的共产主义经济的时代为止。这种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过革命的变革,逐步发展到统一的共产主义世界经济,标志着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质的飞跃。由于排除了国家和民族界限的障碍,共产主义世界经济将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在人类面前展现出无限瑰丽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真正充分和全面发展的时期,从这时方才开始。也可以说,整个人类的真正历史从此方才开始。在这之前,都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前时期”,或者说,整个人类的“史前时期”。

现在,我们正处于在世界范围内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是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充满着极为复杂多变的剧烈斗争的时代。目前,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诞生了中国



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抗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以较高速度的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以中国为例,尽管经过几次折腾,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仍然高于资本主义世界。1952—1978年,我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1%。和1949年比较,1978年的粮食生产增加1.7倍,棉花生产增长3.9倍。1979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本的25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都有较高速度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但是,近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曲折。随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上台,苏联大肆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人类进步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在苏联霸权主义的唆使、利用和支持下,古巴和越南也大搞雇佣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侵略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再存在了。此外,不幸的是,在我们中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横行10年,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几件坏事,都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直接间接地替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打气。但是,这些坏事所造成的曲折,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都只是短暂的一瞬。随着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它们终究会被历史前进的滚滚巨浪所冲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在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上大踏步前进,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便是有力的证明。

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当前世界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主



力军。但它的组成是复杂的。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革命前它们都属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的性质决定它们的革命主要是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这个革命为帝国主义所不容许，为帝国主义所反对。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sup>①</sup>这是他们和中国革命相同的地方。革命胜利后，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它们除了需要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外，都有一个争取经济独立的严峻任务。这是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革命因为“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sup>②</sup>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以外，许多国家在这一点上，是和中国革命不同的。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正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些国家的成长和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今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中国、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少数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外，许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9页。



民族主义国家已经或正在走向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后备力量，逐渐成为它的相对独立的构成部分。另外，有极少数国家还严重依附于外国资本，实际上仍然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作科学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并在理论上作出符合实际的阐述。为此，我们设想在本世纪40—60年代创立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比较发展经济学，来完成这一任务。

第三，在两种经济体系并存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加强标志着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进一步结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不平衡地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促成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为了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人道市场经济”等改良主义措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体化和地区、集团经济产生了，加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在新的条件下具有若干新的特点和变形。在五十、六十年代出现了所谓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后，不仅不断地发生经济危机，而且形成了长期的“停滞膨胀”局面。生产增长缓慢和严重通货膨胀与失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根本无法克服。所有这些新现象、新问题，都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的基础上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它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它还保有一定的生命力。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具有同国际资产阶级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战略策略部署。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地研究这些新现象、新问题，以便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深刻的马



克思主义的说明。

第四,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生产的发展速度。资本、商品、知识技术和劳动力的国际流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实践证明,不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达到一定规模后,必然要求跨越国界,走向国际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更加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生产发展的这种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互相斗争而又互相依存的客观基础。但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以及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必然给生产国际化引起的国际分工的扩大和加深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价值规律等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表现和作用。同时,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有关问题,认真地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作深入的研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不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的内容也将逐步扩大和深入。但总的说来,斗争的发展将使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方向变化。它将逐步改变整个世界经济的面貌。为这场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是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就要在对世界经济领域内上述的和其它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这门新的学科的对象,是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也就是说,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生产关系)的总体。就当前





来说，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教导，在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道，来完成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们初步设想，在80年代我们将使世界经济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对世界经济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此期间，我们还将为建立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也是比较经济学的）两门分支学科积极地准备条件，这两门分支学科就是：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比较发展经济学。前者的任务是用科学的比较方法研究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建设道路、理论和方法，对比这些不同模式的历史、社会和民族条件以及优点和缺点，并给以理论的说明。后者的任务是用同样的科学的比较方法，研究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理论和方法，对比它们的历史、社会和民族条件以及优点和缺点，并给以理论的说明。

进入90年代后，我们将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世界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实和完善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力求到本世纪末，将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比较发展经济学建设成两门独立的相当完整的分支学科。

#### 四、学会的任务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是以我国广大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为主体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它的总任务是：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动全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世界经济学会要注意组织全国有关部门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于世界经济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协助和支持各地的世界经济学会和各个国别、地区和专题性的世界经济问题研究会开展各项学术活动。推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更好地为有关领导部门提供咨询和建议,忠实地当好党中央的参谋和助手。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世界经济学会还要注意发现和培养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有用人才,把培养人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向国外选派留学生和进修生,大力提高现有研究人员和资料人员的水平。要十分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使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真正后继有人,并且后来居上。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除了成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外,还要对《1978—1980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进一步予以落实。我们还要讨论大百科全书《世界经济卷》和《世界经济丛书》、《世界经济大学丛书》的编写工作,以及加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等问题。我相信,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上海市委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这些任务的!

(《世界经济》1980年第6期)



## 认真研究世界经济， 促进我国四化建设

我国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任务，就是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我们是在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尖锐斗争的世界中进行四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项严重任务。我们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实行现代化的有用经验；要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适当利用外资，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认真和及时地洞察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深入地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便因势利导，洋为中用，来有力地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

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国家与国家间虽然有过商品交换关系，但这种国际交换关系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只能是带着局部的、地区的和偶然的性质。只是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才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市场。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世界货币的运用，资本输出的扩大，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直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候，统一的世界经济才最终形成。这个时期的世界经济是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就是全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



进步作用。它消灭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闭关锁国状态，为世界物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它又大大推进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为建立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准备了物质前提。

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从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正如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sup>①</sup>这两个经济体系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个时期，将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和充满着空前剧烈斗争的历史时期，也将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的时代正处在这样的过渡时期。作为世界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而使两个体系并存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无限光明、繁荣、幸福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到那时，全人类才开始完全自觉地撰写自己的历史。世界经济的这种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世界经济的这个过渡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世界经济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世界经济的性质和格局根本变化了。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6页。



主义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同时并存的过渡性质的矛盾统一体。这时的国际经济关系，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旧的经济关系之外，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互相依存、互相斗争，以及它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和合作的新的经济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壮大。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从1928到1940年，国民收入增加了4.1倍，工业产值增长了5.5倍，农业产值增长了30%，这种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荡、衰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产生，使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病入膏肓的总危机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制度更趋腐朽，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恢复、危机（1920—1921年）、相对稳定、大危机（1929—1933年）、特种萧条和危机（1937—1938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期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承受了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负担，这就促使它们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大大削弱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础，大大扩展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大批发展中国家兴起了。这样，世界经济进入了过渡时期的第二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呢？



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进一步发展、壮大，但又经历了和经历着严重的挫折。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出现空前错综复杂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的新局面。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和发展，它们成为两个体系施加影响或争夺的主要对象。在这种基本情况下，世界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方面。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当前世界经济中仍然占着优势。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恢复和整顿，50—60年代，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时，日本、西德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尽管如此，资本主义总危机还是不断深化，周期性危机还是不断发生。1974—1975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回升缓慢，出现了特种萧条的新形态，即经济停滞或缓慢增长、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三者顽固结合的所谓“滞胀”（Stagflation）或“衰退增长”（Recession growth）的新局面。这种局面可能延续一个较长的时间。当然，其间可能发生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可能有个别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有较快的增长。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有缩短的趋势，危机和萧条有频繁和延续的趋势。

国际资产阶级有长期的统治经验。他们为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采取种种手段，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调整，使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方面，当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和措施是：

一、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把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干预（包括计划、国有化、信贷、税收、财政金融、增加军用



品订货等渠道),控制和调节国内和国际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以达到垄断资本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战后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逐步注意制定经济计划,在不同程度上“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在进一步厉行资本集中的同时,注意发挥中小企业灵活性的特点,提高它们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提倡所谓“中间工艺”,即富有弹性的小而精的工艺。另一方面,大企业本身普遍推行生产经营多样化的战略方针,纷纷建立混合联合企业,以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大搞“福利社会”、“人民资本主义”和“人道市场经济”那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国际资产阶级大力推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办法,例如“高工资”,“高消费”,鼓励职工买股票,让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逢年过节向工人送礼,由职工代表参加制定经济计划甚至经济政策,资方和职工协议工资数额,提高利润所得税率,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确实进到了老年和垂死的时期。但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还要力图挣扎,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些局部调整,如同老年人服些补药一样,以保持一定的生命力。

三、十分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新的突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用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和发展部门。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常常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和企业的领导骨干。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预测20世纪末和21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消费水平,试制公元2000年或更远将来的新产品,力争主动地掌握和占领世界市场。

四、资本进一步国际化,国际垄断资本对第三世界采取新的形式进行渗透。跨国公司逐渐成为资本国际化的主要组织形式,它



们控制和垄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命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要求经济独立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强大压力面前,采取一点让步政策,容许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以此来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奋斗,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建立起来,大大扩展了国际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世界新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一方面增强了反帝、反霸、反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后备力量。

其次,我们来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各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基础上,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就大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力量,使它能更有力地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抗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较高速度的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以中国为例,尽管经过几次折腾,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仍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1952—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1%。同1949年比,1978年的粮食产量增加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1979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较高速度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是,近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曲折。随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大肆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这就给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整个人类进步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再存在了。在苏联霸权主义的唆使、利用和支持下,古巴和越南也大搞雇佣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侵略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此外,不幸的





是，在我们中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横行 10 年，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几件坏事，都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但是，这些坏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都只是短暂的一瞬。随着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它们终究会被历史前进的滚滚巨浪所冲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在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上大踏步前进，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便是有力的证明。

上面说过，二次世界大战后，除苏联外，世界上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按重、轻、农的次序安排实施的计划经济。这是一种模式。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实行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自治，体现了比较充分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他们比较重视市场经济，同时逐步注意计划调节。这又是一种模式。中国最初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做法，后来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朝鲜和罗马尼亚又各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吸收其长处，避免其短处，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最后，我们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枷锁而兴起的新生力量，是当代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主力军。它们大体上可分三类国家，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所谓“两头”，一头指的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头指的是那些独立后继续依附于外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这两类国家在当前发展中国家中都占少数。所谓“中间”，指的是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们占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这些国家一般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着



重发展民族经济。它们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强大同盟军。这些发展中国家一般比较穷，有些还很穷，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在当前越来越严重的能源危机和原料匮乏中，有些国家已经拿起多种武器（如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力的斗争。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团结起来，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主干，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以上所说，就是战后世界经济出现的主要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它们，我们必须周密地调查，深入地研究。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今后还会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这种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经过分析研究，提到理论高度，来发展和充实我们原有的世界经济理论，再转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为了适应这个迫切需要，我们提出了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道，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为基础，共同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艰巨任务。世界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的对象，就是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总体，就当前来说，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世界经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是我们今天研究世界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将使我们在了解和研究世界经济问题时得到更加结合实际的专业理论的指导，使我们更加善于透过现象，抓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本质和主流。同时，它又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和介绍各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时，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使这些成果更能起到战略决策时的参谋和助手作用。

我们研究世界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同时，我们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研究



国际经济的方法，例如投入产出法、数理经济学、运筹学、系统工程学、未来学等等，吸收其中的科学成分，丰富和改进我们自己的方法。有的还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改造过来，成为我们自己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应当立下这个志愿，我们应当这样做。这样，我们了解和研究世界的本领就会比较强了。

（《红旗》1980年第9期）



## 按照科研规律， 搞好世界经济研究

当前，我国已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科学，包括世界经济学科在内，在实现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毫无疑问，负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sup>①</sup>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乃是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外国经济的研究。

世界经济是一门重要学科。要搞好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按照科研规律办事。我想就这方面谈几点粗浅看法。

第一，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世界经济研究。

科研的目的是对客观实际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以寻求、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科研工作必须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与实际结合、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实际，即研究对象，“求”是研究，“是”即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研究工作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搜集和积累大量的事实材料，然后对这些事实材料仔细地加工整理，系统地周密地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为了达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到这一要求，有必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加强有关的图书资料工作，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研究人员都要重视和学会做资料工作，做好读书札记和资料卡片、索引工作。二是加强对各国经济的实地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派科研人员出国考察、调研，取得第一手材料。三是加强与国内经济机关和生产单位的联系，了解它们在实行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和需要，以便有的放矢，洋为中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我们研究世界经济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我们必须一切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地掌握详尽的材料，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得出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我们决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过去具体问题所做的现成结论上，墨守陈规，踏步不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待科研的态度，相反，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十分有害，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必须用研究事物内部的运动及其与他事物的联系的方法研究世界经济，用辩证方法来研究世界经济。

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它自己运动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呢？“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sup>①</sup>这说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它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但客观事物互相之间又都是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7页。



有联系的,因此其外部条件对事物变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研究事物内部的运动,而且要研究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它的规律性。如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研究,我们要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实质。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经济集团的作用,通货膨胀、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因素以及某些重大政治因素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才能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规律性及其新特点。

### 第三,科学与迷信根本不相容,科学无禁区。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绝对真理由无数相对真理构成,是“相对真理的总和”<sup>①</sup>,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所以科研工作要富有创造性,要坚决破除迷信,不要被老框框套住。要敢于攻难关,补缺门,勇于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提出新概念,新命题。任何迷信从来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它与科学水火不相容。科学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禁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我们既反对不可知论,更反对“不应知论”。过去研究世界经济有很多禁区,我们要坚决地逐步地加以突破。比如,从60年代以后,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就被视为禁区,不敢从实际出发,加以深入周密的研究。这是不对的,必须打破这样的禁区。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曾指出:“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sup>②</sup>类似上述的迷信,至今在世界经济研究中还有不少。对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我们固然要着重地进行研究,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对于当代资产阶级各派经济理论,我们也必须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它们对于我们都有借鉴意义。其中有些东西是应该着重批判的,但是不研究,不懂得,我们凭什么去批判呢?那不是胡说一通又是什么呢?而我们过去的毛病却正在这里。

#### 第四,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世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它对世界经济的研究起指导作用,为世界经济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原理、经济范畴和经济概念,世界经济必须以此为依据来开展研究。掌握好基础理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就易于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例如,对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如果我们不掌握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和资本垄断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理解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新的特点。同时,对世界经济的深入研究,又可以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世界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两者密切联系,互相促进。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就对英、法、美、德等国家经济研究得非常透彻。马克思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所做的深刻研究,引用的大量具体事例,极大地丰富了《资本论》所要阐明的原理。今天,我们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无疑会丰富和发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光辉学说。

#### 第五,真理愈辩愈明,要大力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客观事物是十分复杂的。一事物往往是多对矛盾的结合体,而每对矛盾都有两个方面。矛盾的发展和暴露都有一个过程。当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于认识它的全貌和性质。此外,一事物和其它事物有多种联系,而人们的认识常常受到一定



条件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民主，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以实践为根据，展开讨论，集思广益，互相补充、矫正，使得出的结论逐步地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比如，世界经济学的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这问题是有争论的，我们就应该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再如，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展开争论，以便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六，科研工作要允许失败，要允许科研人员犯错误和改正错误。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在科研领域，决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决没有不犯错误，一贯正确的英雄。毛泽东同志说：“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於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sup>①</sup> 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中，例如对世界性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危机的预测，由于实践中发现没有料到的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需要改变原来的看法的事是常有的。因此我们对学术上犯错误的同志决不能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应该鼓励人们充分发挥独立思考作用，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提出独到的见解，并允许他们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不致使那些尽管最初看来并不很完整，但却颇有科学价值的新思想、新理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2—283页。





论、新观点被扼杀在它们刚刚诞生的摇篮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科研人员不畏科研道路上的崎岖小道，勇往直前地去攀登科学新高峰。

第七，个人研究要与集体协作、集体讨论相结合。

科学研究是人的逻辑思维活动，通过各个人的大脑活动来实现，因此个人研究是基础。同时，在这基础上进行集思广益的集体协作和集体讨论，又是非常必要的。今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研手段的现代化，集体研究可能不断增多，但个人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仍然是基础，我们决不能轻视。片面地过分地强调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常常容易抹煞人们的独创性，不利于科研的蓬勃发展。不应忘记，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些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主要是他们个人科研的成果。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进行科研，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事科研的优越性，要使个人研究与集体协作、集体讨论合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个人和集体的作用。

第八，科研规划、科研项目要与科研人员个人的研究方向、长处、兴趣、爱好相结合。

就一个科研单位来说，制定的科研规划项目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到本单位科研人员的特点，这样，就不仅能使规划订得比较合乎实际，切实可行，而且有利于发挥科研人员的特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就科研人员个人来说，个人的研究也要为完成本单位规划规定的任务或国家交给的任务而努力，而且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研究任务放在首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自己的专业学科和课题要刻苦钻研，持之以恒，不要随便更动研究方向。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务求逐个突破，有所创新，切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第九，要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时间。



时间是搞好科研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党中央提出必须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 $\frac{1}{3}$ 的时间搞科研。它反映了科研规律的要求,完全正确,非常必要。没有足够的时间,科研是决然搞不好的,必须保证科研人员的 $\frac{1}{3}$ 时间,不要让他们参加不必要的或过多的社会活动。要尽最大可能减少科研人员担负的行政工作和开会时间(学术会议除外)。不要硬叫他们搞形式主义的、无实效的政治学习。一个科研人员一生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是很有限制的,任何一项比较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需要科研人员注入大量辛勤劳动,需要大量时间。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几乎用了大半生的宝贵时间来研究和写作《资本论》,但直到他去世,还没有完成《资本论》3卷的全部创作工作。《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问世,马克思于1883年与世长辞,幸有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才使《资本论》第2、3卷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我们必须充分了解科研工作的艰巨性。

第十,党的领导要引导和保证全体科研人员按照科研规律搞好科研。

各级党委要把科研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所谓臭老九的余毒必须彻底肃清。应当把科研人员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待。他们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应当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热情帮助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向前看,向前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事实证明,党委书记、委员们,经常听听学术报告,参加科学座谈,大有好处。一个科研单位能否把本单位的科研工作搞好,关键在于这个单位的党的领导。党委领导科研工作,首先要引导大家按照科研规律,用科研特有的手段和方法,开展科研工作,决不要单纯地靠行政手段,凭长官意志办事。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科研业务中去,与科研业务密切结合,做得深入细致,逐步地真正地使科研人员达到又红又



专的目标。行政后勤部门则要真心实意地为科研服务，为它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包括提供一定的经费和设备，以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发展经济科学也必须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当然，科研规律对科研工作的要求不止以上几点，本文仅就其要者谈一些看法，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先行官和关键；而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又是这个先行官和关键的关键。

（《经济科学》1979年第1期）



## 评劫贫济富中的“里根衰退”

今年春天我去美国参加美中经济讨论会，对美国当前经济又作了一番考察，了解了一部分美国朋友对里根经济政策的看法。许多人断定“里根经济学”(Reagenomics)必然破产。他们称里根经济政策是劫贫济富的战争经济政策。他们把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叫做“里根衰退”(Reagen Recession)。我看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里根入主白宫后，提出了一个“经济复兴计划”。它的基本目标是：刺激投资，增加供应(生产)，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一年来的实践，证明里根的经济政策遭到了严重挫折。从去年8月开始，美国经济再度陷入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在去年第4季度下降了4.5%，今年第一季度又下降了3.9%。从去年8月到今年3月，工业生产7次下降，降幅达8.9%。4月份工厂开工率继续降低，只达到71%。企业破产严重。破产企业数1981年比1980年增加45.6%，创20年来的最高纪录。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81年12月为950万人，今年3月上升到990万人，4月，实际失业人数已超过1,200万人。据美国劳工部官员估计，今后几个月内，失业人数还会继续增加。里根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陷入了“深刻的萧条”中！这就是“里根衰退”的真相。

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是根据供应学派的理论制定的。供应学派认为：税收过重会严重挫伤人们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复兴经济，必须大规模、持续地减税。里根的减税计划正



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化。计划规定,1981年10月1日减税5% 1982年和1983年再分别减税10%。他们估计,这样做,可以使1984年的储蓄率提高到18%,1986年更达到18.8%,从而使生产得到增长。但第一次减税后,投资并没有增长,生产反而下降了。为什么减税反而促成了减产?这是因为:里根的减税计划规定减少对企业 and 个人的所得税,企业越大,资本家越富,就按累进比率减得越多,他们偷税漏税神通广大,许多资金用到别的方面去了。而中小企业家和一般公民,则减得很少,即使有少量的减税收入,他们在害怕通货膨胀的心理影响下,往往把减税所得的收入用于消费,而不用于投资。结果税率下降了,储蓄和投资却并没有增加,有时反而出现储蓄和投资减少的情况。

除减税外,里根政府还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说到削减开支,人们常常认为是削减政府的开支总额。实际上,按照供应学派的思想,只要生产增加了,即使降低税率,政府收入总额不但不会减少,反会有所增加。因此,里根计划削减的并不是政府支出的绝对额,而是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绝对额削减的只是政府用于社会福利和保险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开支。里根政府认为,到1984年预算能得到平衡,但执行结果,1982财政年度的赤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估计1983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也将超过1,000亿美元。出现这种情况,一则因为生产并没有得到恢复,收入当然也没有象预计那样得到增加。二则因为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和军火财团(他们是里根的脊梁骨)财迷心窍,迫使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以加强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力量和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实力地位。1982、1983财政年度的预算开支中,军费开支比1980年分别增加516亿和852亿美元。这说明,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军费开支剧增有直接的关系。在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里根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失



业救济金和教育经费削减了，失业工人，特别是黑人青年工人和大中学校学生受到很大威胁，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加上里根政府扩大核武器生产的计划，遭到广大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的反对，全国规模的反核武器运动，如同当年反对侵越战争的运动一样，正风起云涌。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根据是供应学派，但货币学派主张的坚持稳定货币政策也是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一个重要支柱。由于严格控制货币的供应量，通货膨胀率确实下降到了6%左右，但利率却随之上升，一度高达20%以上，现在徘徊于16.5%左右。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和各种预算外开支，政府需要筹集大批资金。目前，它们约占全国可供贷出的资本的35%。这使市场上的高利率更加坚挺难下。高利率阻碍了投资的增长，使中小企业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加速破产。信贷利率上升给汽车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带来的打击特别严重，因为这些部门的产品主要是依靠消费信贷得到销售的。可以说，高利率的影响现在已经扩展到了美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使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使回升更加困难。

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充满矛盾、顾此失彼的政策。它抑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却又造成了生产下降，因此，无法把美国经济从长期停滞和危机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里根政府原来希望通过减税来促进储蓄，但高利率却抵消了减税给企业带来的刺激投资的效果。它原本希望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平衡预算，但庞大的军费支出又使预算出现大量赤字。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人们都在担心庞大的财政赤字将会迫使高率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本来，里根政府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收外国流资，平衡国际收支，结果却又使出口受阻，进口增加，出现大量贸易逆差。这最终又会使国际收支难以平衡。供应学派是反对用国



家干预制造“有效需求”的，但大量增加军费显然就是为了满足军事工业增长的需求。这说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发展后的今天，完全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是不可能的。里根经济政策之所以陷入困境，归根结蒂是因为它和历届美国政府一样，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它劫贫济富的减税计划和削减福利开支等措施，只有使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去年3月，我在杭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上曾经说过：“里根政府尽管信奉供应学派”，但“它对美国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会比卡特政府少多少。”“不论颓于破产的凯恩斯主义，还是时行的货币学派、供应学派，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年多来，里根政府的实践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一点。

里根的经济政策在国际范围内也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

首先，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固有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美国经济的衰退使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特别是美国实行的高利率政策，使大量资金从西欧流向美国，阻碍了这些国家投资的增长。为了防止资金外流，西欧国家也不得不提高本国的利率，使企业投资更加不振，经济回升更加困难，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西欧国家普遍认为，美国持续的高利率，是使去年年底开始好转的西欧经济重新恶化的重要原因。它们说，美国的高利率“正在毁灭欧洲不景气的经济”。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的结果，疲软的美元转向坚挺。欧洲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破坏了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今年2月，比利时法郎、丹麦克朗和卢森堡法郎宣布贬值。法国法郎也面临贬值的危险。为此，西欧各国纷纷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为对付国际萧条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寻找解决办法”。前不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如果美国不降低利率，加拿大准备在7国首脑会议上同美国摊牌。西欧其它国家的首脑也有类似的表示。



高利率也加剧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美国企业大批倒闭为日本向美国进一步渗透创造了条件。如美国的国际收割机公司,在过去2年中,由于产品滞销和支付巨额利息,亏损严重。今年2月,它不得不宣布,将把一半股份出让给1家日本公司。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上升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扩大了。1981年,逆差额达到创纪录的180亿美元。在美国施加强大压力面前,日本虽然表示,将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要求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美、日之间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正在酝酿之中,其规模和尖锐程度,比过去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济危机和高利率使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更加趋于紧张。经济危机使世界原料价格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6日发表的报告,去年世界原料价格比1980年下降15%,是1975年以来降幅最大的一年。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为了支付贸易逆差不得不增加向发达国家借款,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高利率又使这些国家支付利息的负担更加沉重。到去年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达5,200多亿美元。利率每提高1%,发展中国家就要多支付利息50多亿美元。美国的高利率实际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困难的一种手段。加上里根执政后,又大肆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更加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美国的经济衰退也促使里根政府在和苏联加强争夺的同时,又制造缓和假象,它一面压西欧盟国减少同苏联的经济往来,而自己则争先恐后地同苏联做生意。里根上台后,取消了对苏的谷物禁运,主张和苏搞核谈判,便是证明。

经济衰退使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对美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去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55亿美元左右。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预计，今年两国的贸易额将达到 65 亿美元，1985 年可望达到 100 亿美元。这无疑将有助于美国经济情况的改善。美国副国务卿斯托塞尔最近也指出：“让中美之间过去曾经存在的敌对永久存在下去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而是应当向前看到今后几十年中美之间的密切合作”。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中一部分对台湾投资集团，执着地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坚持所谓的“对台湾关系法”。这是公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完全违反两国“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的不法行为，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是广大美国人民所不同意的。这次我在美国费城开会时，曾向美国朋友提问：“如果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竟然通过一个‘对宾州关系法’，中国政府竟然不顾你们联邦政府的反对，硬要出售武器给宾州或费城，你们将感到怎样？”美国朋友异口同声地说：“那绝对不行！那是强权政治！是霸权主义！”中国有句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奉劝处于“里根衰退”中的里根政府，能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真正民意出发办事，不要做绝了，否则中美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瞭望》1982 年第 6 期）



## 展望和探索的国际盛会

——在1981年杭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

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现在开幕了。请允许我代表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向从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 23 个国家和地区远道前来的代表们和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这 80 年代的第二个春天，我们相聚在这风光明媚的西湖之滨，举行这样一次盛大的讨论会，目的就是为了展望 80 年代世界经济的前景，探索和寻求解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70 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之后，不同国家的经济虽然有了短时期的程度不同的回升，但总的说来，并没有摆脱“滞胀”的局面。停滞、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成了抱成一团的顽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各国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总的说来，没有达到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所提出的目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仍然比发达国家慢。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和能源困难。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令人遗憾地还在继续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也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可以说，目前世界各国，尽管政治经济制度有



所不同，却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认真研究 80 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为克服经济衰退、危机、失业、通货膨胀、贫穷而努力，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肩负的光荣而艰巨的职责。

国际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世界经济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国际科技转让和资金转移对于各国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了。在目前的世界上，已经不能设想，发达国家能够踩在一些极端贫穷国家的头上，而使自己的经济得到顺畅的发展了。人们越来越把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看作头等重要的问题，看作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了。

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说明，80 年代将是一个充满着紧张、动荡和危机的年代。同时，我们须要看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更加强大的积极因素，这就是世界广大人民要求发展生产，消灭贫穷和落后，争取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代表着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代表着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只要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坚持不懈地奋斗，世界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经济必将朝着有利于人民，有利于进步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10 亿人口的资源比较丰富的大国。我们有着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的巨大潜力。我们要竭尽全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在国内,我们把政治上实行安定团结,经济上进行调整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以便把我国的国民经济置于一个更加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在本世纪内初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与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对全世界和全人类起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愿意全力以赴地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次会议将采取大会和小会相结合、集中讨论和个别交谈相结合的多种形式进行。我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充分而又自由地交换意见,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果,以求造福于世界人民。

我预祝会议得到圆满的成功!

祝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和所有的朋友们、同志们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世界经济》1981年第5期)



## 国际讨论的丰硕成果

——在 1981 年杭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上代表中方的总结发言

朋友们、同志们，

一个国际性的世界经济讨论会现在就要结束了。我们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 位经济学家、银行家和企业家长途跋涉、相聚一堂。一周来，我们在杭州的明媚春光中，会见了许多新老朋友，大家就共同关心的 80 年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展望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次讨论会的一个特点是学者和银行家、企业家坐在一起，生动活泼地进行了讨论，使这次会议既具有广阔的视野，又紧密联系经济活动的实际。展望 80 年代，许多国家的经济将面临种种困难和问题，国际经济关系也将发生种种动荡和不安。在这个时刻，就使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共同研究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显得十分必要。

这次讨论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世界经济的展望与中国的现代化规划联系起来考虑。正如梅尔文·厄尔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指出的：“80 年代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调整政治和经济关系，使之更适应长期发展和增长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各国企业家“对中国的现代化规划表示关心，不仅是由于战略的、政治的性质，也由于它对世界经济具有潜在的巨大



影响”。正是这种认识,把我们大家引导到一起,摆事实、讲道理,使我们这一次讨论会具有与一般世界经济讨论会不同的、独特的重要意义。

几天来,我们的讨论会经过全体参加者的共同努力,有了丰富的收获。这主要是:(一)大家就80年代世界经济的前景,从各个方面交换了意见,进行了讨论,并且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解决若干重大问题的对策。(二)对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外国朋友们对此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三)促进了经济学家们的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为加强中国和外国经济交往寻找了若干渠道。我认为,所有这些成就说明我们这次讨论会预定的目标已经胜利地达到了。现在,我想就8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和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两方面的问题,参照会议的讨论,讲几点意见。

## 一、关于8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

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对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表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乐观的估计认为,80年代,美国、日本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将有较快的发展,至少将高于70年代的增长率,甚至可能达到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的增长水平。相反的意见认为,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将徘徊不前。现在看来,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经济滞胀是困难的。80年代的发展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可能在低速增长中前进。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依然可能发生。现在大家对于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经济主张讨论很多。这些主张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对军事工业的发展可能带来较有力的刺激。但是,这种主张能否实现是受着多种复杂因



素的制约的。就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来说，人们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调整和取舍，现在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把未来的10年称为“调整的10年”。但是，这种干预本身并不仅仅出于某种经济学派的主张。它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美国里根政府尽管信奉供应学派，但它的实践将会证明，它对美国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会比卡特政府少多少。历史将证实，不论濒于破产的凯恩斯主义，还是时行的货币学派、供应学派，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60年代和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深了。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已经基本形成。西欧和日本等国家正在日益向美国市场渗透。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瓦解。世界市场的竞争更趋剧烈。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另一面，科技革命使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得到空前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欧经济一体化增强了成员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他们的竞争能力。世界经济领域内的这种变化在80年代还将继续下去，它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在80年代，都将继续走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一般地将以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苏联从50年代下半期，特别从60年代以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大搞霸权主义。它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大肆扩军备战，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其他有关的重工业，造成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居民购买力和消费品供应之间比例关系经常性的严重失调。这样就形成农业长期落后，经济效率低，消费品生产不足，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困难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苏联试图进



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只要它继续推行世界霸权主义，在80年代，苏联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有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变。加上能源供应趋于紧张，劳动力日益缺乏，苏联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低于70年代。这种困境反过来又将推动它对外加紧侵略扩张，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必将自食其果。

哈拉尔德·马姆格雷先生在这次讨论会上正确地指出目前东欧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能源非常困难，农业生产低下。这是事实。

令人高兴的是，近十多年来，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在，这些国家如何发展民族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关心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在我们的讨论会上，不少代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必须着重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与外资的关系。对于外国资本是采取利用、限制、监督的政策，以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还是采取完全依附的政策，使这些国家重新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问题。其次是如何调整国内各种不同经济成份之间的关系，以便使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和混合经济等成份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战后的实践证明，在这些国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较长时期内保留多种经济成份，互相补充，各得其所，是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的。相反，不顾本国情况，过份强调国营企业和国家计划的作用，使私人经济和合资企业的正当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对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只会带来不利的影晌。第三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选择最有利的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战略。现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初级产品的出口，有的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有的侧重于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有的则强调平衡发展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战略。在实践的基础上，研究各种发展战略的





长处和短处,结合本国的实际,制定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以便加速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独立的能力,是各国经济学家应当肩负的一项光荣的任务。

关于南北对话问题,我想讲几句话。必须指出,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被称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的今天,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60—70年代初,发达国家原料消耗总量中,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比重,动力原料由15.9%提高到26.6%,其它矿产品由19%提高到22%左右。在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绝对量的增长仍然十分迅速。发展中国家作为商品销售市场的作用也正变得更加重要。目前,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向日本出口的4倍,为向西欧共同体出口的2倍;西欧共同体向第三世界的出口,3倍于向美国的出口,20倍于向日本的出口。去年2月,以勃兰特为首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在向联合国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不要把其同南方的贸易看作是威胁,而要看作是机会,不仅要把它看作是问题,而且要看作是解决办法”,认为“除非南方有了长足的进展”,否则北方是“不能繁荣起来的,也不能改善其处境”,这种看法是比较符合当前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的。我们坚决支持在南北对话中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对若干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比较公平优厚的待遇表示赞赏。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两个“10年发展战略”规定的目标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其外部因素来说,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基本上仍然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决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进步和昌盛。这



次到会的许多代表,从使80年代世界经济能够比较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要求进一步打破“南北对话”的僵局,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步伐。在当前,就是要对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国际经济制度中得到应有的反映。为了在国际经济生活中逐步建立平等、互利的新秩序,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强内部的互助和合作,强调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战后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一种重要的新现象。罗比森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东盟在地区性合作方面的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许多朋友在大会和分组会上指出,我们在探讨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时候,决不能忽视政治因素。我们通常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同时政治又会对经济发生强大的反作用。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充满着动荡与不安。因此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加紧反对霸权主义,批判那种助长霸权主义的绥靖主义倾向。

科学技术对于世界经济的巨大推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于光远同志和米勒博士在大会的发言和一个专门小组会上的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机器的发明,电子和原子能的利用,电算机的创造和广泛使用,都在不同时期促使世界经济的面貌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破。科学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直接的生产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生产的格局,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格局。米勒博士正确地指出,经济条件又影响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和经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强烈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容许和创建的科学技术,比起封建制度来,要丰富几百倍、几千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特别是垄断



资本对尖端科学技术的垄断和保密，限制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则能够容许和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充分顺畅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在当代已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国际学术交流和技术转让，应该成为科学家和专家们的重要职责。对此，各国政府应给予鼓励和保护。先进工业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该给予关切和支援。

## 二、关于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在大会发言中，薛暮桥、卜明、季崇威三位同志分别介绍了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中国吸收外资的情况和政策；汪道涵同志介绍了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经济建设的情况；亨利·埃德温·罗比森先生介绍了西方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计划的评价。这些内容丰富的讲话，在分组讨论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各小组经过认真的探讨，使代表们对正在调整中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讨论中，多数外国朋友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认为是必要的，稳妥的。但也有些朋友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变得太多太快了；也有些朋友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利用市场调节，吸收外资等等，怀疑中国是否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我认为，外国朋友的这些怀疑和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我国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1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是卓著



的。我国的粮食产量比 1949 年翻了一番多。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过于一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成功地制成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人民生活比解放前也好得多了。但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有不少错误，其中主要的是“左”的错误。这种错误严重地发生在 1957 年以后，它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忽视经济建设，忽视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建设领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上了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错误道路。这种情况在 1958 年大跃进，特别在 10 年大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表现得最为突出。结果，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1976 年，中国人民胜利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但从 1976—1978 年，我们没有足够估计 10 年浩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上的“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盲目扩大了。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反对闭关自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当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这种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贪多求快，进口成套设备的规模又搞得太大，超过了实际需要和可能。这种冒进的错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失调，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此着手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但是，由于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认识不足，加上许多部门和地方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体会不深，贯彻不力，基建战线仍然没有缩短，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还没有收缩。因此，尽管近两年来，整个经济形势，



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实际国民收入，需求总额超过了供给总额，结果，出现了财政收支不平衡，消费品供应不足和物价上涨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纠正，将成为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危險。为此，我们政府于1980年决定对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个大调整，决定该退的要退，而且必须退够（例如某些重工业项目），该上的必须积极地上（例如农业、轻纺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困难，消除潜在的危險，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从长远来说，我们自觉地清醒地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就是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真正摆脱“左”的思想和做法的束缚，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各项事业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从而避免今后再次出现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避免再次进行大的调整，发生左右摇摆、曲折多变的情况，而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稳步前进。

由此可知，我国政府这次关于实行经济进一步调整的决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是在新情况下的继续和发展，而决不是它的中断或改变。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人类历史上还处在少年时期。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摸索在自己的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适当地稳妥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我国还在认真执行计划生育，防止人口盲目膨胀的战略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我们的经济搞活，为了发展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提高我国广大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 10 亿人民的坚强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决心。有些外国朋友怀疑，我国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利用市场机制，实行经济核算，扩大盈利，实行中外合营企业，等等，是所谓向资本主义后退，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总之，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目标是决不会改变的，至于具体的发展速度和措施则要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随时加以调整。我们对外经济开放，吸收外资和先进技术，和各友好国家实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步骤上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力求稳妥，要在做好培养干部和职工、积累经验、制订法规、提高消化能力等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我们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下，继续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在实行的步骤和方法上则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它逐步完善起来。美国朋友马姆格雷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面对着 80 年代缓慢增长时期，“各国政府就什么是 80 年代的适宜的经济政策问题还在进行大论战。对策是变动不定的。”这些话是指西方各国说的。我国经济政策的变动的可能性肯定会比马姆格雷先生对西方国家的估计小得多。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对我们的这种乐观精神和高度信心是能够理解的。罗比森先生在他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对中国来说信仰危机是不必要的，就是一个证明。中国政府制订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将遵循这种指导思想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本国的经验，借鉴一切外国的有益经验，作为改进我们工作的参考。在这次会议上，外国朋友们对我国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改进计划工作，改善企业管理，举办合营企业，改进出口贸易工作等等，都是对我们有帮



助的,我们将仔细地加以分析和研究,以利于我国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样,我国现有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我相信,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将同我们一样,深信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东方,将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次讨论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各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能够在一起交换对 80 年代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收获是丰富的。我相信,这次讨论会将和杭州西湖秀丽景色一起,留在我们美好的回忆之中。

(《世界经济》1981 年第 5 期)



## 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1982年6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召开的“国际经济关系讨论会”上对若干问题的商榷性发言

### (一) 当前世界经济具有怎样的基本格局？它的发展前景如何？

我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片：(1)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社会主义国家；(3)苏联和东欧国家；(4)发展中国家。把世界经济分成四大片，是否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从政治上提出的当前世界人民斗争的战略规定。把世界经济分为四大片则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来划分的。

当前世界经济四大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关系。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将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很大的成功，社会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后胜利。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怎样？1981年4月我们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在杭州联合召开国际经济讨论会的时候，我在代表中方的总结发言中曾指出：当前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说来，供应学派学说、货币学派学说以及已经被认为失灵的凯恩斯学说等等，这些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措施，都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





度上收到一些效果，但是它们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治之症有根本的疗效。一年多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被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生产停滞甚至萎缩，通货膨胀在个别国家虽然暂时略有缓和但仍保持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失业越来越严重，这些事实就是有力的证明。看来，8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将维持有所起伏的“滞胀”和危机的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如果出现某种情况，譬如科学技术有新的重大突破、南北对话与合作真能顺利地发展以及备战势头更加显著等等，西方经济也会出现新的显著高涨。但是，这种可能性看来并不很大。

从基本发展趋势上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确是衰老了，但是它能够靠吃些补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维持一段生命。这些补药就如中国的人参、鹿茸，老年人吃了还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益寿延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一定的经济计划，搞人民资本主义和福利社会等，这些都起到了局部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从而还能够允许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是，这些补剂都不可能根本克服现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资本帝国主义最终还是要寿终正寝的。

苏联实行霸权主义是一个铁的客观实际。它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大搞霸权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全世界。它打着“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主义”、“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支援革命”、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国际分工”等等漂亮的旗子，用军事占领、政治控制、经济渗透等等手段，力图在全世界造成一个完全新型的殖民体系。由于经济和实力的加强，它在争霸世界的战略中日益采取全球性的攻势。近年来我在美国、西欧讲演的时候，总是希望朋友们不要把我们中国



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混在一起，统统纳入所谓东方国家之林。因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少年时期。它只有 65 年的历史，经验少，还很不成熟，难免常摔跤。苏联大搞霸权主义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摔跤的最严重的例子。我们中国搞文化大革命，造成了 10 年内乱，经济濒于破产，也是一个例子。柬埔寨搞社会主义犯极左的错误又是一个例子。因为这些，使得社会主义这面伟大光荣的旗帜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降低了威望。但是，摔了跤可以爬起来。我们中国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由于党和政府政策的正确，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这就是证明。社会主义遭遇这种或那种挫折，这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们从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从摔跤的地方爬起来，重新振作精神，改正错误，就可以使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胜利前进。

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怎样看法，在我们这次讨论会上表现出分歧，这并不足怪。按照我们的看法，发展中国家是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它乃是世界未来的希望所在，是未来繁荣昌盛的世界经济的坚强堡垒。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在我们的讨论会上也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是那些民族主义国家，它们大力发展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上述发展中国家大体相当，它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里目前占少数。发展中国家中的另一个小部分是一些基本上没有脱离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状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从整个说来，发展中国家的三个部分当前处于两



头小、中间大的状态。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是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部分，从它们中间，在一定条件下，有一部分将来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而另外一些国家，可能较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类型，主要也是根据社会经济制度来区分的。现在流行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分法很多，有些是根据生产特别是对外贸易情况来区分的，如产油国家、进口替代国家、出口替代国家、新兴工业国家等等；有的是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来区分的，如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等。究竟哪一种区分的方法比较科学，我建议大家进一步加以研究。

## (二) 南北对话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是杜撰和荒谬的吗？

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认为南北对话，特别是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凭空杜撰，是荒谬不合理的。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认为，提倡南北对话，增进南北经济合作，特别是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为此而斗争，这不仅是合理和可行的，而且是当前已经存在的铁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应当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的今天，世界范围贫富差距的扩大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一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以，倡导南北对话，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当前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势头。

发达国家在燃料和原料供应、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



力的来源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发达国家所需石油的75%靠发展中国家供应，发展中国家还提供了除石油以外世界主要农业和矿业原料的60%，许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明显上升。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大发其财，1970—1978年，西方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共约422亿美元，而同期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利润却高达1,002亿美元。目前在西欧和北美有近1,000万外籍工人，他们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干着发达国家中许多人所不愿意干的最脏最累的活。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矛盾和斗争的关系。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依赖于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更多地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国土、人口方面都占1/3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和巨大的劳动潜力，发达国家如不依靠这些，它们的经济的恢复和顺畅运行，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西欧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对南北对话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主动促进南北经济合作，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赞赏。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它们的民族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我们看到，世界政治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以发达国家居于垄断和统治地位为特征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老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它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加快经济发展的努力，起着严重阻碍和破坏作用。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贫穷落后的症结所在，也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基础上的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必须改革的，而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定要建立起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坚决站在支持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立场上，并且积极参与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斗争。1974年联合国特别大会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而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为制定《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的努力，我们都完全同意，并热烈支持。联合国第二个10年发展战略规定，发达国家应以国民生产总值的0.7%来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完全支持的；而且对在行动上不符合这一规定的国家，我们提出了批评以至谴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南北经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对南北首脑会谈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

一个真正的完全平等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我认为只有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能做到。现在为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有多么大的公开和隐秘的阻力和破坏，它必将逐步加以克服，取得胜利，这是肯定无疑的。

### (三)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没有规律？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阻力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我们力求按照这些规律办事。首先，要按照全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要遵守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起作用的价值规律以及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起作用的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当我们的政策和行动符合这些经济规律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比较快，而当我们没有很好实现这



些规律的要求或违反这些规律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便会遇到挫折和困难。我们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却常常违反这些规律，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我们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改正这些错误，防止重犯这些错误，避免遭受损失。

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曾经犯过“左”的错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三起两落。特别是10年内乱，我们的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主要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曾经很通俗地讲过，“我们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们要吃饱穿暖，但不能吃光用光，而必须提取一部分资金来搞建设。我们一定要适当地安排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关系。

近年来我两次到美国，了解到有些朋友担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计划经济为主、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些是否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我告诉他们说：不会。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运用市场机制为辅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经济搞得更活，更好地实现国家计划以及弥补国家计划经济之不足，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必要的补充部分，它们的存在和运行对于方便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生产责任制并没有改变我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是改变经营管理的某些体制和方法，使集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物质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更好地发挥工农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它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



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确立起来的坚定信念，它是牢不可破的，走回头路是绝不可能的。

这两年来我到美国、西德、法国访问的时候，有些朋友对我们中国的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表示担心。我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国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个月我在美国时，曾告诉美国朋友说，就政局稳定这点来讲，现在我们中国决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些。

有的美国朋友担心，我国政府的政策多变。我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政策是在政治上维护和巩固安定团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这些政策，只会随着新情况的出现而有所发展，不会改变。我们的政策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有的朋友问：“什么叫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它们之间是否矛盾？”我们说，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国家的资源、资金、劳动力和聪明才智，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争取外援为辅，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借点外债，与外国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如合资经营、补偿贸易等等。外援的范围很广，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也属于外援。这些外援可以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力量。同时以这种日益增强的自力更生力量为基础，又可以不断地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

近年来，中美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中美两国建交以后，两国间的双边贸易成倍地增长。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是富有潜力的。但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却存在着阻力。最近美国



里根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给中美两国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这就是一个大的障碍。当我最近访美的时候,许多美国朋友向我表示,他们反对里根总统这种侵犯中国主权、违背自己诺言的做法。例如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曾对我说,他于今年5月4日曾对里根总统提出反对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意见。我真诚地希望在座的美国朋友们能和我们一道,共同努力,克服各种阻力,使中美友好关系得到更顺畅的发展。





##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这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力量演变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分析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我国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因此，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内部团结，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一、第三世界兴起的伟大历史意义

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前，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输出资本的场所。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时整个世界被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由“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sup>①</sup>，即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获得政治上的独立，随后形成了第三世界。到目前为止，第三世界国家中取得独立的已有 120 多个，它们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占世界领土总面积 61%，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78%。它们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这是战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以前，犹如一盘散沙，任人摆布和宰割。独立后，相似的历史遭遇和面临的共同任务，使它们在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共同战斗。1955 年 4 月 29 日亚非国家首脑在印尼万隆聚会，提出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指出了正确方向。1961 年 9 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及 1964 年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发展会议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组织起来，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讲坛，严厉谴责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掠夺行为，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其正当权益而进行的斗争。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进一步深入到经济领域，它们为发展民族经济和争取经济独立，展开了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并成立了许多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的组织以及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响亮地提出了打破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1973 年石油斗争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1974 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纲领，并为实现这一纲领进行不懈的斗争。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重重障碍，尤其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南北谈判目前



还处于僵持状态。但是，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大，经济自主权日益扩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任意摆布第三世界国家命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使之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国家资源极为丰富，单就矿产来说，除蕴藏大量石油外，许多战略金属的储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sup>①</sup>。但是，这些资源过去只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繁荣”，为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只能是贫穷、饥饿和落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为发展民族经济和争取经济独立，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和实施了各种发展战略，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实行经济多样化，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第三世界的民族经济已有了可喜的进步。1950年，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9.1%，1978年达15.1%。发展中国家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也由1960年的11.1%提高到1979年的15.4%。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提高，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也不断扩大。最突出的例子是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惩罚其背后支持者，运用“石油武器”，实行石油“禁运”，收回石油标价权，大幅度地提高石油价格，对西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作为一个因素（当然，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西方国家自身的基本矛盾）诱发了西方国家战后最严重的1974—1975年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

<sup>①</sup> 如铜占全世界58.5%，铝75.7%，锡88.5%，镍58.2%，镓72.7%，钴79.1%，钨65.4%，铈89.7%，铍73.7%，锂60.8%，铟87.3%，铷87.5%等。



陷入“滞胀”的困境,开始了低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品开始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它们的多国公司<sup>①</sup>也迅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力量了,在某些经济领域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提出了挑战,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为经济危机和“滞胀”而苦恼,找不到出路。不少西方开明人士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办法,求得“全球繁荣”。这种看法虽然打上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烙印,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趋势:第三世界国家是未来世界经济繁荣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已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已经大大增强。尽管它们还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欺凌、掠夺和剥削,但它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是任人宰割的“奴隶”,而是新时代的主人了。这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历史、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差异,它们在独立后就走上不同的发展方向,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在夺取革命胜利后,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有少数国家,至今仍处于殖民地状态,或者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

<sup>①</sup> 据统计,1979年,美国以外的500家最大公司中,其中34家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比1978年增加48%。



实际上,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仍然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控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建立并巩固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发展民族经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决非偶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前后,除存在着严重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外,国内前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占很大比重,民族资本极为薄弱。因而,它们需要在清除或削弱外国垄断资本势力的同时,积极发展民族资本。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们还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说,还处于对外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对内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在它们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和分散,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有了一定的力量,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文化水平较高,社会联系较广,组织能力较强,因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并在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推动这些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再从国际环境来看,战后,帝国主义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不放弃武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了新殖民主义的手法,即承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独立,鼓励它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使它们继续留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以便继续掠夺和剥削它们。另外,5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妄图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它的霸权主义行径,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崇高威望,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社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从而从反面支援了资本主义体系。

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改造殖民地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不断巩固和加强政治独立。

许多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依据本国国情，制定和实施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这些国家独立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主要有国营经济、私人民族资本经济、个体经济和外国资本经济，因此，具有普遍和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调动各种经济成份的积极性。

一些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通过国有化和创办国营企业，削弱了外国资本的控制，掌握了本国的经济命脉，巩固了政治独立，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前进的道路。印度独立后，国家资本全部垄断了电力、军火、石油天然气、煤炭、铜铅等的生产，控制了航空、铁路、邮电、保险等部门的经济活动。到7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已达六百多家，投资额已占全国注册企业投资总额的50%，拥有整个生产能力的60%。<sup>①</sup> 国营企业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60—61年度的10.7%上升到1978—79年度的19.4%。<sup>②</sup> 巴西的国家资本企业的经济力量也已超过本国私人资本企业和外资企业。据1977年对巴西2,000家企业的调查，国家资本占绝对优势的部门有：交通运输(93.8%)、石油提炼和销售(87.4%)、采矿(69.8%)、黑色冶金(66.3%)、公用事业(90.9%)，其中铁路运输、港口、电讯则完全由国家控制。阿尔及利亚的国营企业到70年代初，在各经济部门中所占比重为：水电96%，采掘93%，碳氢化合物部门78%，加工工业69%，其中，冶金82.7%，

① [印度]查兰·辛格，《印度的经济政策》，1978年版，第64、63页。

② [印度]《印度储备银行公报》，1957年12月和1979年12月增刊。



建筑材料 87%，化工 57%，食品工业 75.6%，纺织工业 34.1%。<sup>①</sup>

私人民族资本是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它的力量十分薄弱。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为支持和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规定某些行业主要由私人资本经营，国营企业不得涉足，并在税收、信贷、价格、市场、原材料供应、劳动力培训和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对私人企业提供方便和给予优惠。例如印度的 20 家私人大企业的资产总额从 1966 年—1975—76 年度期间由 233.5 亿卢比上升到 511.1 亿卢比，增长了 120%。<sup>②</sup>与此同时，印度的中小企业有了显著发展，小型企业从 1961 年的 3.57 万家增加到 1977 年的 50 多万家，同期，投资总额从 34.8 亿卢比增加到 345.2 亿卢比，产值从 66.5 亿卢比增加到 844.7 亿卢比，职工人数从 43 万增加到 545 万。70 年代后期，小型工业的产值约为全印工业总产值的 40%。

个体经济在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繁荣民族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许多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对它们采取积极扶植的政策，使其逐步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他们通过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土地问题。有些国家战后初期由于片面重视发展工业，忽视农业，因而农业生产日趋萎缩，进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农业，逐步改革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帮助农民解决资金、水利设施、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个体手工业者是现代工业的补充，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少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帮助个体手工业者解决资金、原

① 法国《欧洲—海外》，1976 年，第 557—558 期。

② [印度]查兰·辛格，《印度的经济政策》，1978 年版，第 72 页。



材料供应、生产技术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成立了手工业服务中心，促进了城乡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和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因此，它们在主要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地吸收外国资本的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只要加强管理和监督，改善外资的使用方法，吸收一定数量的外资，有利于加强民族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许多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规定了外资股份的最高份额，这对于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外资垄断国民经济命脉，加强对外资的管理和监督，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都是有好处的。

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的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积极性的方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二次大战前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长期徘徊在2%左右，50年代提高到4.8%，60年代又提高到5.9%，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同期5%的增长率；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降为5.1%，但仍高于发达国家3.3%的增长率。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有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些国家不仅向发达国家出口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出口一些精密机械和仪器等技术密集型产品。

当然，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还遭受国际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城乡贫困阶层的生活还很困苦。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只要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它们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不断提高生产力，壮大民族资本，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反帝、反霸、反殖的力量，对人类进步事业必然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 三、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我们的光荣国际义务

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维护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控制、掠夺和剥削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它始于世界市场的诞生，最后形成于资本帝国主义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打着“自由贸易”、“等价交换”的旗号，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和资本输出等，实现其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酷剥削。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它以雄厚的资本力量，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贸易和关税总协定”等，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控制世界市场，成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脊梁骨。

第三世界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它们在这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诸如农业发展缓慢，粮食问题严重，国际收支恶化，债务负担沉重，通货膨胀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扩大，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等等。造成这些困难的症结之一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继续存在。因此，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强烈的愿望。

1964年3月，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发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制定和通过了处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关税优惠，要求发达国家拨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援助发展中国家等。在这次会上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里走上了联合斗争的道路，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作了组



织准备。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斗争的伟大胜利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走向高潮。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庄严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它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原则，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反帝、反霸、反殖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以后，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行动。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坚持原则，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第三世界国家所要求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际上是要求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就是说，由各个国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他国家一起，平等地参与和制定有关国际经济问题的决定，加速各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具体地讲，在行使经济自主权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对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永久享有主权；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改革；有权对跨国公司实行监督和管理；有权参与世界经济的有关活动，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在贸易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贸易制度，确保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改善其贸易条件和地位；取消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普惠制，扩大其工业制成品向发达国家出口。在金融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它们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无权地位，争取在这些机构中有更多的决策权，改善和加速资金转让，“免、减、缓”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在调整和改革世界经济结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渐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要



求修改工业产权制度,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转让。

这些内容归结起来,就是减少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加速民族经济的发展。这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触及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利益,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一斗争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还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因而它们目前所要求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不是以消灭帝国主义的剥削为目标,而只是要求减轻和限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进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还处于民族民主斗争的阶段。它具有浓厚的改良色彩。而且就是这种改良也只能是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斗争的产物,决不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恩赐。当然,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只有在全世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当前第三世界为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恰是为它的实现作必要的准备。

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进行的斗争是十分艰苦、曲折的。1975年5月,“南北对话”在巴黎举行,由于根本利益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聋子对话”,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终于在1977年6月以失败告终。1979年第三世界各国倡议在联合国内举行全球谈判,但由于美国的阻挠,未能如期举行。1981年10月,经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协商,在墨西哥坎昆城举行了南北首脑会议,就举行全球谈判问题交换了看法,一致同意要为此继续进行磋商。后来,在第三十六届联大会议上仍因美国持保留态度而未能达成协议,南北全球谈判处在僵持状态。



这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必须把立足点移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南南合作，才能推动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实力，开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新局面。近几年来，第三世界国家本着平等互利，相互支援的原则，在贸易、资金、金融、人力、科学技术等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并成立了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82年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当然，由于殖民制度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破坏，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它们在发展经济合作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南南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那种否定南南合作伟大历史意义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它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它面前，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支持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是我们应尽的光荣国际义务。我们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合作，共同战斗，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 四、排除干扰，将争取建立国际 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1974年2月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划分是



分析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二次大战后第三世界兴起，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对世界人民斗争的伟大贡献。它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同，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首先遭到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的剧烈反对。他们否定第三世界的客观存在，污蔑第三世界国家倡导并为之奋斗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杜撰”的、“荒谬”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劳伦斯·克劳斯 1982 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召开的国际经济关系讨论会上说：“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们通过各种努力人为地建立一个国际经济秩序，有可能是危险的”，它“将过分强调产品的分配，而不是强调增加生产”。在 1981 年 10 月举行的坎昆首脑会议上，某些西方代表也有类似的言论。我认为，这些否定第三世界的存在、否定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斗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前面所说，二次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是铁一般的客观事实，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发达国家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然存在，是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仍然贫穷落后的症结所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顺乎民心，合乎正义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要求改善贸易条件，增加援助，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还要求转让技术，改革国际经济结构。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增加生产”。因此，那种指责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仅仅是为了



在国际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从发达国家“多捞一点钱”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谋士们竭力鼓吹这些谬论决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维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既得利益，煽动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同他们一起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但这种别有用心企图是徒劳的。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识破他们的阴谋，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斗争。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人用一些极“左”的词藻，否认第三世界的存在，反对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例如日本有位评论家在《现代之眼》杂志1982年7月号上发表文章说，第三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七十七国集团只不过是乌合之众”，它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只是“同帝国主义在国际阶级同盟这一基础上进行谈判”，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割断一切联系，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他甚至认为：承认第三世界的存在，支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衰退”，是“倒退”到第二国际水平。这种貌似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同上述西方垄断资本代言人的高论完全蹲在一条战壕里的“革命”空谈。

他们否定第三世界的存在，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一条主要理由是所谓：战后，发展中国家“已进入资产阶级全部买办化、全面从属化以及同帝国主义全面结成同盟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全部变成了买办阶级”，国营企业“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属品”。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表



现出他们一定的积极性、进步性；而且，他们在国家独立后，为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与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继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并作了斗争，他们在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包括掌权的资产阶级，从总体上说，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发展的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些为民族资产阶级集体占有的国营企业虽然不是“全民的财产”，但是，它们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发展本国民族经济过程中，具有进步意义。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中，的确还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不依人们主观臆想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发展中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一般地还具有两重性，即除了前面讲的反帝、反霸、反殖，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这一革命的、进步的方面以外，还有剥削劳动人民，同外国垄断资本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因而，他们在为争取国家独立和目前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动摇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我们也要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原因，在经济活动中与外国垄断资本的某些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带有买办性。当然，这和完全投靠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是有重大区别的。例如，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早的国家里，城乡资产阶级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拥护宪政，反对独裁统治；积极主张本国实现工业化；支持土地改革；反对外国控制本国经济命脉；既反对拉美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他们是当今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正如列宁指出的：“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



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sup>①</sup>当然，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主义彻底性，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里所表现的程度还是有差异的。

上述那种否定第三世界存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依附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边缘”；“边缘”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尽管战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它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由于帝国主义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全部变成了买办阶级，因而，它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程度更为严重。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控制、掠夺和剥削，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输出资本的场所，这正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赖，而帝国主义却把附庸地位强加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勃然兴起，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尽管帝国主义为继续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为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枷锁，逐步取消了其给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收回了海关、货币发行权和自然资源的租让权，已不再是任凭帝国主义摆布的“附庸”了。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已不再存在剥削关系。但这种剥削在方式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那种超经济的剥削绝大部分已不复存在，现在主要是采用资本输出和国际贸易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为解决发展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困难，实行了适当吸引外资的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政策。但是，外资的剥削一般地已不再带有宗主国对殖民地剥削的强制性质，而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所必然要付出的一定代价。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作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的，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世界市场和本国的实际情况安排、管理对外贸易。尽管它们之间的贸易还存在着不等价交换，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垄断资本的剥削，但这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掠夺性贸易显然是不同的。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已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例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沙特、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美国、西德、英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投资逐年增加。截至1982年第一季度末，这3个国家在国外投资总额达2,650亿美元，所得收入超过270亿美元。当然，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无足轻重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仍有强大的势力，甚至还能左右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从总体来说，随着民族资本的成长，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例如1949年外国资产在印度全国企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为55%，1956年已降到36.3%，1976年又降为17.9%。<sup>①</sup>在巴西100家最大企业的资产中，外资的比重由1968年的37%降到1977年的11.5%。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已不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视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否认第三世界的兴起，把已经取得独立，并形成了一股新兴力量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说成是“依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边缘”，无疑是不切合实际的。

“依附论”者还强调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身内部推动力”，

---

<sup>①</sup>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再考察》，1978年英文版，第271页。



它们将永远处于“依附”地位，不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这个结论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sup>①</sup> 人民，社会生产力，永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它们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要求提高自己的发展水平。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真正的“内部推动力”。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发展的“自身内部推动力”，而必须到帝国主义国家那里去寻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推动力”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人类社会永远处于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历史上，不仅美国在200年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它已成为高度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原来不都是殖民地吗？但今天谁能说它们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呢！目前，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占一定比重，但少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有可能赶上某些西方国家，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当权资产阶级是否能够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是否能够制定和实行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继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还取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发展南南合作，加强集体自力更生，增强谈判实力，迫使发达国家作出较大的让步，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6页。



斗争中取得较大的成果。

还应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前途是多样的。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斗争，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独立后，资本主义经济（包括本国的和外国资本的）有一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有所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越来越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当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同国际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出卖民族利益，残酷剥削、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时候，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它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蜕化为纯粹的买办资产阶级。这时，这些国家就将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那种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谈不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俄国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不就是最好地证明了落后或比较落后的国家，只要条件具备，就能取得革命胜利，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吗？当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自己的先锋队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持，集中打击最反动的、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最主要的主观条件。

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壮大，随着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深入和发展，正确地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不断地得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指出，第三世界的壮大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成就都在为人类最美好的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日益成熟的物质条



件。从长远看,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全人类一样,都要走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这是一个长期的,但是最终必将实现的历史过程。一切逆时而动的社会势力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让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一道,为这一无限美好愿望的逐步实现而共同奋斗吧!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



# 80年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 和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1982年11月24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演

## 一、80年代世界经济的展望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的是怎样的基本格局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基础，一批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由此，在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世界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此同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出现了广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

从50年代中期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逐步蜕化，推行霸权主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

从此，世界经济便由战后初期那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相对峙的局面，逐渐变为以超级大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样四类国家或四大片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格局。当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基本格局。

这四大类国家经济的基本情况怎样呢？

(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经历了40年代下半期



的恢复之后,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廉价石油的利用,到50—60年代,便进入了高速增长期的所谓“黄金时代”。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趋尖锐,油价猛涨,西方世界陷入了经济危机与“停滞膨胀”交替发作的困境。生产停滞甚至下降(经济增长率从60年代的4.9%下降为70年代的3.4%)、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三者紧紧抱住,成为极为难治的痼疾。不过,西方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中仍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

(二)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中期起,苏联蜕变了,但中、朝、罗、南等一些国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它提示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各国在建设初期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在经济上实行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片面强调行政管理手段,忽视经济方法和市场调节,因而使它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一些挫折。但后来它们都先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已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效。

(三)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一些国家。苏联领导利用列宁、斯大林时期所创建的巨大物质技术力量和本国的丰富资源,以发展军需生产为主导,使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实力稳步壮大。它以“国际主义”、“国际分工”、“非资本主义道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为幌子,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渗透、控制和扩张。这类国家的力量在当前世界经济中占第二位,仅次于资本主义国家。

(四)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它包括120多个国家,国土和人口都占世界的 $\frac{2}{3}$ 左右。这些国家由于国情不同,独立后的发展方向也很不相同,但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它们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大体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因而也属于第三世界。它们在第三世界中目前只占少数。第二类，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民族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大发展。这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现在占大多数。第三类，基本上尚未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优势的国家。这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占少数。以上就是第三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构成。此外，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经济的发展模式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贫富极为悬殊。但是，尽管第三世界各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内部矛盾很多，它们在当前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联合战斗的倾向毕竟是主流。它们是世界未来发展和繁荣的强大支柱和坚强堡垒。

现在，我对 80 年代世界经济作一下粗略的预测和展望。

首先，我想谈谈进行预测的方法问题。

当前西方学者所采用的预测方法很多，如概率计算法、趋势外推法、德尔斐法、移动平均法、计划平估法、模型模拟法、关连树法和反馈法，等等。这些预测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某些科学的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运用。但是，我认为经济发展是由客观规律，首先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展望和预测时，主要应该根据若干重要的经济规律，从当前实际出发，来进行分析和论断。在展望和预测 80 年代的世界经济形势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如下经济规律和若干对世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然后运用上述各种方法中的科学成分作为运算和推测的工具。

(一) 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及其变形。资本主义的再生产



过程，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正常情况下，呈现出由繁荣到萧条到危机，然后再回升到繁荣这样一个定期的（例如 10 年或 5 年左右）周期循环。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加强了干预，固定资本更新也具有某些新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时，必须对这一规律及其变形有充分和正确的认识，并且要特别注意研究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及其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影响。

（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营管理的不断改进，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预测 80 年代世界经济形势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的作用，曾因经济管理体制上所存在的弊病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但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并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

（四）苏联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在估计苏联的经济发展趋势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霸权主义政策对其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影响，尤其要考虑它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特点。

（五）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对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在预测和展望 80 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时，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因素的作用。





(六)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战后，科技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尽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但以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加速酝酿。我们在展望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时，必须把科技发展及其可能的重大突破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

(七)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规律。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我们在估计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时，一定要注意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要注意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注意各国（特别是几个大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西方有人估计80年代中期将爆发大战，理由是那时苏联对美国将具有决定的优势。我们要认真研究这种可能性。至于局部战争，则连绵不断，我们也要密切注意和研究它们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

总之，我们主张着重依据在经济过程中起作用的上述客观规律和重大因素，来对世界经济进行预测和展望。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8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大致如下（我们在这里不作确切的预测）：

首先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1974—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滞胀”之后，1979年从美国开始，又先后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应付危机，克服“滞胀”，美国里根共和党政府采取了以供应学派为主、货币学派为辅的主张，英国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采取了货币主义政策，它们的目的在于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鼓励投资，促进生产，制止通货膨胀。法国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名义上实行自由社会主义，实际是基本上采取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干预，扩大国有化，增进社会福利，着重解决失业问题。这些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基本上治不了“滞胀”和危机的重病。里根政府自己承认美国经济深重衰退。财政赤字庞大，失业率创战后记录。减税并没有促进投资



和生产，而巨大赤字又将加剧通货膨胀。西欧各国的经济普遍陷入危机和萧条。日本经济也困难重重。看来，在80年代，“滞胀”和危机交替发生仍将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一般说来，这些国家只能在低速（比如年增长率1—3%）增长中前进。当然，如果出现科技突破、能源替代或局部战争等情况，也可能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遇到能源或金融方面的较大变动，又可能再度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如果在80年代中期发生世界战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是世界人民，包括超级大国的人民在内，害怕和强烈反对核大战），整个世界经济的制度和结构将发生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

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已基本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剧烈和科技革命的不断前进，这种不平衡状态在80年代将进一步加剧，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之势将更加明显，它们之间的矛盾将更加激化。

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虽然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有的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但他们在80年代将继续在经济改革中前进。它们的增长速度一般将高于西方国家，人民生活将进一步改善。

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一些国家，在80年代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增长速度将较70年代为低，但将持续增长。苏联军需工业比重将继续增加，农业和轻工业难于得到大的发展。但苏联东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集约化，在80年代将收到效果。总的说来，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将进一步缩短。

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初期的平均增长率，估计仍将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但它们的发展极不平衡，产油国和新兴工业国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6—7%，南亚和一部分非洲国家可能只有3%左右，甚至更低些。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负债过重、



政局不稳，特别由于西方国家转嫁危机，跨国公司加强垄断和剥削，80年代的经济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当前，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的矛盾正在加深。由于美国的抵制，南北对话遇到了重重困难。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挑拨和分化，又使南南矛盾有所增加。这些都将给第三世界为南南合作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增加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的今天，世界范围贫困差距的扩大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一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此外，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十分有利于它们贯彻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和加强相互间的合作。这些都有利于南北对话获得进展，并将促使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取得新的胜利。从总的趋势看，世界经济正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 二、80年代中国经济的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建设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曲折，特别是十年内乱，使我国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是巨大的。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1倍。从1953—1981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8.1%。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时，这些事实又说明，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幅度又大大



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还相当低，我们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还很不够。原因在那里？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9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此，我国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79年增长7.2%。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8.7%。1981年，由于调整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财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农业继续丰收，轻工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工业生产略有下降，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继续得到提高，1981年，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比1978年增长43%。

1982年计划，根据着重进行调整、整顿，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规定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81年增长4%左右。要求农业和轻纺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工业要由1981年生产下降转为上升。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要求消费部分增长5.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8%，积累部分增长3.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项事业费用支出增长5.9%。做到财政和信贷的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物价基本稳定。从1982年1—10月的实施情况看，工农业生产形势喜人，市场活跃，对外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预计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可能比1981年增长5%，其它各项计划都可以超额完成。1982年10月15日日本《每日新闻》以《在世界萧条中，中国经济扬眉吐气，1—8月工业生产增长9.1%》为题，报导了日本经济企划厅10月14日公布的7—9月海外经济报告，指出中国1982年1—8月重工业生产增长了9.8%，超过了同一时期轻工业的增长率8.5%，指出在世界一片萧条中“经济情况格外良好的显然是中国”。以上情况表明，3年来我国政府实行的以调整为重点的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通过对过去6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正确地决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大会规定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推向前进。大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

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从1981—2000年，经过4个五年计划，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本世纪末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用我们的日本同行的话来说，中国人民决心用两个“倍增计划”的奋斗来达到上述宏伟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决心在今后20年内牢牢抓住三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一、农业，二、能源和交通，三、科学和教育。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要农业上去了，就会带动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能源和交通的紧张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保证国民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加强能源开发，大力节约能源消耗，同时大力加强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建设。按照我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各国的经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而人民大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关键之关键。因此，我们决心大力加强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训各种专业人才。同时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和技术改造、革新，组织科学和技术的“攻关”。

为了实现两个倍增计划的战略目标，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决定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也就是说，80年代——准备，90年代——振兴。

80年代是我国实行第六和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期。

正在举行的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讨论和通过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六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们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和联合，有重点地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要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六五”期间，由于我们把主要力量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现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高，大体上是确保年增长率4%，争取达到5—6%。要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同时要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继续合理地降低积累基金所占的比重（比如说，降低到占25%左右），适当提高消费基金所占的比重（比如说，提高到占75%左右），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我国将于1983年开始拟订第七个五年计划。在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期间，我们将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开展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继续完成企业组织机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



的合理化。同时要继续着重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这三个战略重点。“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将略高于“六五”计划,比如说,大体上将力争达到年增6—7%。

1981年9月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些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经验积累。这十条方针就是: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六、研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它们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是从毛泽东思想汲取来的。

一年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了这十条方针,使1982年的经济建设有着比1981年更好得多的进展。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完全肯定了这十条方针,并且决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特别要注意解决以下4个重要原则问题。这4个重要原则问题是:

——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国家的重点建设必须得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一定要搞上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



目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巩固和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在城市和乡村都要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又要要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鼓励适当地发展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国营和集体企业中都要实行经营管理的责任制；在农村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工商业企业中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这种计划管理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这种计划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来实现）两部分。此外，作为计划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不作计划，由企业根据价值规律自行安排生产。

——坚持自力更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国要大力扩展对外贸易，尽可能多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积极地引进一些适用的先进技术，以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我们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行为。

80年代，我国将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实行“六五”、“七五”计划，作好准备，打好基础，迎接90年代新的经济振兴，实现工农业年总





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20年翻两番，意味着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经过努力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试想我国从1953—1981年，尽管经济发展屡遭挫折，特别是遭到十年内乱那样深重的灾难，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仍然达到8.1%。当然，这个数字可能有些虚假成份，但是去掉水分，年增长7%左右是可以肯定的。例如1979—1981年，是我国经济的调整时期，虽然放慢了建设速度，但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仍然达到6.7%。日本从1957—1970年只用14年时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0.4%。我国人民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贯彻上述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特别着重技术革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借鉴日本和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坚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一定能实现。

### 三、8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2,000年之久。不幸的是，近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先后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和保守、反动势力的破坏。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中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27日终于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日建交后，两国政府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以及其它协定。1978年8月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它标志着



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几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发展。1982年，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10周年，我们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使两国人民的友谊进入“芳邻一带水，友谊万年春”的崭新阶段。

从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地发展。1981年中日两国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为1972年10亿美元的10倍，开创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新局面。日本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frac{1}{4}$ 。我国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和材料，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向日本出口的燃料、原料和农副产品，也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在其它经济领域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我国利用日本资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向中国的六项重点工程、海底油田勘探和煤炭开发、续建大庆和宝山钢铁公司有关工程等，陆续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优惠贷款。由日本政府提供贷款帮助建设的石臼所港、兖州——石臼所铁路，北京——秦皇岛铁路扩建和秦皇岛港扩建等4个项目正在积极进行建设。另外2个项目也正在设计和小规模施工。中日两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渤海南部和西部石油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日本方面正积极参加我国南黄海石油勘探开发的投标，并且希望今后能从中国就近进口更多的石油。

中日合作开发7个煤矿项目，计有山东兖州的鲍店煤矿、山东枣腾的蒋庄煤矿、山西古交的西曲煤矿、河北开滦的钱家营煤矿和山西古交的镇城底煤矿，计划年总产量2,100万吨。这些项目大多数已开始建设，进展顺利。

在合作经营商业方面，也已胜利起步。中国土畜产总公司、机



械总公司和辽宁省已先后在东京同日方有关企业成立了合资贸易公司,双方在北京也开设了3家合资贸易公司。

随着中日两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双方互设常驻代表机构日益增多。现在日商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重要城市已设有日方常设代表机构一百多家。中国方面的粮油、土畜产、纺织、轻工、工艺、技术、机械、化工、五金矿产等十多个总公司和中国银行也已派出代表到日本工作。

1981年初,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中由于宝山钢铁公司等问题,曾一度引起波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正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日方派遣技术人员到中国,或者由日本企业对中国有关企业负责实行技术指导,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形式。例如1982年1月,日本本田技研公司同四川的嘉陵机器制造厂签订了合同,规定由本田公司除提供一部分设备和零件外,派遣技术人员为提高嘉陵机器厂制造摩托车的质量和降低成本而进行合作。又如日本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从1982年1月起,开始对北京第二汽车厂制造2吨重小型卡车进行质量管理的指导。

我国利用日本资金还采取了在国外募集债券的新形式。如1982年1月22日,我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日方在东京签署了一个筹募100亿日元债券的合同。到1月29日,就有三十多家日商缴纳了这笔款项。条件是:期限12年,利率8.7%。所募集的资金由中国用于自主地开发稀有金属等方面。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着信心。预计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原则下,必将更加灵活多样、丰富多



采,更加富有效益,获得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根据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到1990年,中日贸易额将从现在的一百多亿美元增加到二、三百亿美元,即增加1—2倍。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开辟了新的途径。中日两国银行之间的资金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从日本引进设备的合同项目必将以较大幅度增加。随着两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国之间的海运和民航事业也将迅速发展,从而中日海上与空中桥梁必将越来越宽广。中日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将越来越活跃,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因此,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预计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80年代这一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必然会遭遇这种或那种障碍,也必然会发生曲折。首先是因为,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史实,并且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这些势力,一直在阻挠和破坏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他们念念不忘早已破了的“大东亚共荣圈”,妄想染指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他们死也不承认过去加诸中国的战争是侵略,对侵华战争的元凶和战犯顶礼膜拜,千方百计地颂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精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以及其他各国人民对此必须加以严重警惕。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复交后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交往的发展都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不断排除干扰和克服障碍的结果。今后如果真要而不是假要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往来,就必须继续认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sup>①</sup>这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将继续发展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所在，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谁都破坏不了，阻挡不住。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现在全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正确方针，奋起努力，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真是前途无量。只是眼下资金不够充裕，技术还比较落后。日本经济比较发达，技术和经营管理比较先进，但是缺乏资源，特别是缺乏能源，市场狭窄，对外依赖性大。因此，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充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只要我们两国人民根据两国政府共同认可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方针，齐心协力，排除障碍，80年代直至90年代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一定会出现非常可观的辉煌的新局面，这是肯定无疑的。

谢谢在座的朋友们！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2页。



##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自从1979年我国政府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工作后,中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以1970年固定价格计算,总计达到6,619亿元,比1979年增长7.2%。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992亿元,比1979年增长8.7%。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我国经济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对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部门和地方对调整方针贯彻不力,基建战线仍然过长,行政管理费和非生产费用没有做到应有的压缩。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基建开支和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这样,就出现了财政赤字,信贷不平衡,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使我国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危险。因此,中国政府于1980年年底决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这个大调整,决定该退的要退,而且必须退够(例如某些重工业项目);该上的要积极地上(例如农业、轻纺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困难,消除潜在的危险,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从长远来说,这是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真正摆脱过去“左”的思想束缚,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使国民经济避免再次出现比例的严重失调,从而能够持续健康地稳步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这次关



于实行经济大调整的决策，正是 1979 年提出的调整方针在新情况下的继续和发展。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以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我们对这点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认识有片面性。现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生产力低正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总任务。这就纠正了过去的偏差，使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有了保证。其次，社会生产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为着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为着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现在我们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就是要逐步改变经济结构，着重发展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煤、电、油等能源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并着重现有企业的挖潜和技术改造，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努力缩短建设周期。同时，要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降低近年来过高的积累比重，逐步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 25% 左右。必须按照正确的比例关系发展国民经济才能有真正的持久的高速度。

经济调整是中国今后几年内的中心任务，但同时必须进行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必须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而两者必须相辅而行。不逐步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要完成调整任务是困难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我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我国目前存在的一小部份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将长期存在。这种多种经济成份的长期存在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产还只能是一种商品生产。它的产品，不论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还都是商品。但这是一种



特殊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它将在计划指导下有效地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服务。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不合理地利用市场机制,利用价值规律,不尽量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那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不能搞活,国家计划也不能很好实现。而要合理利用市场机制,我们就应该保护和鼓励计划指导下的适当的竞争,打破那种划地为牢,按行业划线,各自自成系统的垄断局面。只有这种合理的竞争,而不是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合理垄断,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厉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加企业收益,提高经济效果。

此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必须奉行的一个重要方针。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沿袭了苏联 30—50 年代的模式。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不能适应地方特别是企业的具体情况,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的利益不能得到应有的照顾。这是迄今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弊病。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外国经济体制进行试点,着手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作,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权限,计划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价格体制以及外贸体制等等。

这里,一项关键性的改革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社会主义企业应该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自负盈亏,逐步做到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享有生产的计划权、经营管理权、产品的销售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两年前从四川省开始,目前全国已有 6,600 多个企业正在进行着这种试验。实践证明,上述试点单位在经营管理、产量、产值、产品质量、盈利和职工生活改善方面都比非试点单位好得多。这项试验今年还将





继续下去,以便积累更多的经验。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它实质上涉及到企业的所有权问题。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的生产资料应归全体人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它的生产资料应归这个企业的全体公民集体所有。但是,由于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再加上我们没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封建式的家长制度和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和普遍。结果,许多生产单位的广大职工,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为企业的完全的主人。他们还没有享有企业的生产管理权和产品的分配权。而这里的前提必须是企业享有应有的自主权。这个自主权扩大了,随着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建立,职工逐步享有各项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如对厂长、经理的选举权、聘任权、罢免权以及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生产计划权、经营管理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分配权等等。这是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果,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保证。

当然,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都必须服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利益。在当前我们大力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消除潜在危险的时候,更不能削弱国家应有的集中,不能损害国家的全局利益。

最后,我国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必须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全国和各地的各项优势,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发扬各种各样的长处,避免各种各样的短处。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推行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之间的联合,实行专业化协作,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经济渠道,逐步形成一系列大、中、小型的经济中心,破除各种不合理的封锁和垄断,极大地提高经济效果,增加经济实惠。

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调整 and 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在完成上述调整改革的任务之后,中国经济将会以持续的较高速



度稳步前进,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作出较大贡献。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继续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这些光荣艰巨的任务。

(《中国企业》,香港,1981年)



## 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 几个理论性问题

###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还处在少年时期

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算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今不过六十几年的时间，不象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六十几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很短暂的。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少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为社会主义制度描绘了一个大体的轮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共产主义最初尝试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几天。马克思虽然对巴黎公社的实践作了杰出的总结，但它存在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列宁亲自领导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提供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列宁对此也作了很好的总结。在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但列宁去世的太早了。后来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在他领导下，苏联确实建成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批国家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时的苏联就成了这些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榜样。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大家都纷纷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实际上，除了南斯拉



夫被情报局开除以后另搞一种模式之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按照苏联的那一套做的。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向前发展。进入五、六十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出现了两个大的曲折。一个是苏联实行向外侵略扩张的政策，搞霸权主义。另一个是我国在六、七十年代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这两大挫折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而恰恰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却出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使一些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主义动摇起来，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的蛊惑宣传，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因此，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怎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包括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

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诞生以来只有六十多年，在我国则只有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不少的失误，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我们要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到底怎么搞法，这里就有一个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从俄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料是很不同的。他们预料，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是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获得成功。后来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低的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获得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



商品和货币的社会。马克思尽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等等，他们确实设想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商品、货币这些东西了。例如马克思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sup>①</sup>恩格斯同样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sup>②</sup>而后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证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和货币还需要长期存在。

由于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一劳永逸地为社会主义社会设计出一种具体蓝图。这种具体的模式，连同它的经济体制在内，对我们来说都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刚刚产生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摸索的过程。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摸索了千百年的时间，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摸索了很长的时间，走过很多弯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要打倒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实现这样一种根本转变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更加需要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不走一点弯路是不可能的。

那么，所谓经济体制究竟是什么呢？经济体制包括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各种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职能及其相

---

① 《资本论》第2卷，第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互关系的東西。比較具體地說，在社會主義中國，它規定計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組織和功能（作用）及其相互關係，規定中央與地方管理經濟的職權，規定各個部門和各種經濟組織的職能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例如這一級或這一類經濟組織與那一級或那一類經濟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各種經濟組織與它們的組成人員（職工、社員）之間的關係等等。

經濟體制涉及到生產關係，或者說是生產關係的一部分。經濟體制的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生產關係的重要內容。而且經濟體制一經確立，又會反過來對生產關係的幾個主要方面發生重大的影響。例如對所有制的影響，如果在經濟體制上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里的職工沒有什麼管理權力，而這種權力完全掌握在廠長或書記手里，那麼就會影響到所有制的實質，使這種所有制實際上可能變成廠長或書記所有制，而不能說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又如，對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影響，如果經濟體制不是真正體現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工人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就可能喪失，人們之間同志式的互相關系就可能變成一種主仆關係。經濟體制還直接影響到產品的流通和分配。例如經濟體制對計劃管理和市場調節的規定就會產生這種影響。

經濟體制也涉及到上層建築，或者說，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就經濟體制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例和制度來說，顯然是屬於政治、法律的範疇。例如，經濟體制所規定的管理機構的設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條條和塊塊的關係等等。在這方面，經濟體制中包含有政府組織和許多法律形式的規定。

上面我所談的關於什麼是經濟體制的问题，目的並不是要給它下一個完整的定義，而只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引起大家的關注和探討。因為在討論中，有些同志把經濟體制說得很廣，似乎包括了整個的生產關係；另外有些同志則把經濟體制說得很窄，好象跟



政治毫无关系。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究竟什么是经济体制，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弄清楚，否则我们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就不大容易有共同的语言。

## 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经济体制包含着很广泛的内容，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这里，我只想就两个主要问题讲点个人的意见：一个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条条和块块的关系问题。下面先谈谈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从历史上看，对经济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划或计划，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庄园的管理也是有一定的计划的。大观园里的王熙凤便是这样一个管理能手。甚至对一个封建国家，也有过越王勾践那样的“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宏观长期规划。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企业里都有严密的计划。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商品生产最发达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迫使代表整个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也采取各种国家干预的手段，包括制定形形色色的国家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从凯恩斯学说提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为盛行。现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美国等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他们的国家计划；就连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西德政府，实际上也有一定的经济计划，它对全国的劳动力就实行从中央到各邦的集中和严格的管理。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同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计划，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社



会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只有在这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够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利害关系的对立和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由于它是最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从根本上说，只能导致社会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而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真正的计划调节。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并不排除竞争，相反，它扩大竞争的能量，因而更加激化了竞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调节总是以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才有产生全社会的真正的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场是和商品生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商品经济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简单商品生产。在罗马奴隶制度时期，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作为会说话的生产工具，也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但在奴隶社会和随后的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都还只是附属品。商品经济既为封建社会服务，也对封建社会起着瓦解作用，最后终于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到这时才取得了最完备的形态，不仅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了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统统成为商品和货币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经济，还存在着少量的作为补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各个经济单位之间，都还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经济活动中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社会主义生产还必须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关系。但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有本





质的区别的，更不能把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我们有些同志怕搞商品生产，以为一搞商品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完全是误解。10年内乱时期就是把必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商品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并不一定会出现资本主义，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如果管理不好，市场机制也会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一种破坏作用，这就需要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制约，就是说，由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起某种鼓励或限制的作用，许可或禁止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机制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补充计划的不足，可以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可以把经济生活搞得更活跃，更加丰富多彩，从而能够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还存在着少量的个体经济的时候，不仅生活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基本上也是商品。市场机制在计划指导下，是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起积极的调节作用的。

斯大林在其晚年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的发展。但斯大林即使在那时也仍然坚持：一，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二，市场不能起调节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斯大林的这两点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即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没有计划管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但也不能没有市场调节作为计划机制的辅助手段，否则，国民经济就会搞得很



死。只是片面地强调统一，强调集中，就不能把经济搞活。反之，片面地强调市场调节，国民经济就会被搞乱。要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就必须既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加强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又要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包括它的调节作用。

陈云同志在1956年就曾讲过：“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肯定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明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前一个时期的讨论中，纠正了过去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市场不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好的，是主流。但也存在一点片面性，主要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而对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计划经济这个方面有所忽视。现在我们强调一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几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又有一种忽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片面性。我认为，上述两种片面性都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在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同时，计划工作本身也需要改



进。国家计划必须根据社会需要来制定。所谓社会需要，主要指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消费品（包括文教卫生）的需要，此外有国防和出口的需要。国家计划要抓全局性的东西，包括基本建设规模，人民生活水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等等的关系。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那些产品，比如粮食、棉花、油料、钢铁、能源等等，都必须由计划来控制，列入指令性的计划。要采取领导、群众代表、专家三结合，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反复协商的办法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比较地切合实际。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还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发挥价格、利润、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 三、中央、地方和企业，以及企业领导 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央、地方和企业，以及企业领导和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它主要涉及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这是集权和分权关系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必须坚持中央握有集中的大权，同时也应使地方分享一部分权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列宁很重视发挥各地区的首创性和主动精神。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充分顺利地发展。”<sup>①</sup>又说：“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0页。



行官僚主义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sup>①</sup>他坚决反对中央对地区性的事情乱加官僚主义的干预，主张地方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拥有广泛的权力。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展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苏联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倾向，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我国建国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过去总的倾向是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分权不足。对此，近年来已作了一些调整。过去不论在部门管理还是在地区管理方面，都容易产生各自分割的现象，不利于实行国家统一计划管理。因此除了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权力以外，更主要的是要打破条件（部门）、块块（地区）的束缚，形成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合理的经济联系网络。

第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也是集权和分权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前，经济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手里，而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的企业几乎处于毫无自主权的地位。国家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实行统一包干制，企业生产所需的物资由国家调拨，产品由国家包销，盈亏由国家负责，这就极大地压抑了企业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弊病。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扩大企业在经济上的权力，加重它们的责任，改变企业“吃大锅饭”的现象，调动企业的主动性。但是，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只能是相对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接受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说，要使国家对全国经济的集中领导和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减轻了对企业进行具体管理的繁琐负担，可以更多地考虑和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并使企业的重大决策不致脱离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页。



国家利益的轨道；而企业也摆脱了国家施加的过多束缚，调动了企业的主动性，又可以给经济工作注入更多的活力。

第三，企业领导者和职工群众的关系。这是在企业内部的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企业内部，应该强调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指出：“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领导职务。”<sup>①</sup> 列宁所讲的，就是群众对领导者应当有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同时，列宁也强调纪律性。他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团结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sup>②</sup> 又说：“无产阶级应当以严格的求实精神和从大工业的利益出发，来实际地解决劳动人民的纪律问题、组织问题和领导权问题，因为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sup>③</sup>

有的同志担心在企业里由职工代表大会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会不会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上变成集体所有制企业？我想是不会的。全民所有制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强调职工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否则，就会妨碍职工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职工群众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就会影响到所有制的实质，使其不能充分体现出生产资料真正属于全民所有的性质。当然，我们在相信职工群众的同时，也要教育职工群众必须服从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

---

①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2页。



#### 四、苏、南、匈三种经济模式

为了搞好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认真地参考外国的经验。广义地讲，所有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都要参考借鉴。狭义地讲，我国和东欧国家在建国初期都是沿袭苏联的那套经济体制，有着更加相似的经历，因此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和借鉴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从目前的情况看，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三国的经济体制，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些国家的不同模式，对我们都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苏联模式，它也是大多数东欧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的模式。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这是在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当时苏联处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因此需要实行高度集中的，严格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体制，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有限的经济力量集中起来，加速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体制，苏联才能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很快地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技术改进，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并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的。当然，后来的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有着很大的弊病。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与美国争霸世界。我们在这里撇开这方面的问题不谈，单就苏联经济体制来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先后都搞了改革。赫鲁晓夫扩大了地方的经济权力，注意了市场和利润的作用，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以至建立了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跨出的步子是比较大



的,但搞得草率鲁莽,结果,他搞的改革基本上失败了。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某些错误,比较慎重地进行改革。他注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在计划体制和方法方面作了较大的改进。但总的看,苏联近二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迈的步子很小,成绩不大。

**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建国以后,也跟着苏联走了几年。1948年被情报局开除后,另找了路子。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特点,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当然有不少缺点,但我觉得这种模式有两大贡献:一是突破了原来的思想束缚,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尽管南斯拉夫在强调市场作用方面有一点过头,但这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毕竟是一个重大贡献。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体现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体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企业里实行工人自治制度。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或工人代表大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选举或招聘厂长,也可以撤换或处分厂长。职工群众在企业管理方面享有广泛的高度的民主权利,我认为这也是南斯拉夫的一个重大贡献。

**匈牙利模式:**匈牙利在很长时期内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促使匈牙利领导人下决心搞经济改革。他们既看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那些缺点,也看到了南斯拉夫模式中的一些优点。因此匈牙利能够有比较地、有准备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形成了相对说来是较为有效的经济体制。例如计划同市场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匈牙利都处理得比较恰当;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也比较注意发扬。匈牙利的经济发展是很有成绩的。当然,匈牙利的经济体制也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由于匈牙利是个小国,资源贫乏,对外依赖性很大,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很



多的困难。

在目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不管是哪一种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都还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都还在继续进行。而且应该看到各国的具体国情很不相同，我们在借鉴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做法时，都要考虑到这一点，绝不能生搬硬套。

## 五、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

几年来，我们经济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是很有成绩的。但总的看来，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和讨论都还很不够，需要我们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为此，我有如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我们十分需要认真地读一读马、恩、列、斯、毛泽东同志和陈云同志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例如列宁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问题，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关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关于发扬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民主包括工人参加管理的问题，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问题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这些我们一定要很好学习。

另一方面，苏联以及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他们研究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著作和文章已经很多。我建议把这些东西大量翻译或摘译出来。这些国家对于经济体制问题，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有些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在它们那里是老问题了。我们把他们研究的成果翻译过来，可以作为我们重要的参考材料。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著





作和文章,也需要我们翻译过来作为参考。

第二,要调查研究。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新现象、新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许多新的问题出来了,到底怎么办?工厂里面也有许多新问题。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以及外贸体制方面也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第三,要认真总结经验。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包括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误和教训。近三年多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实行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都应该加以认真的总结。

第四,要提倡进行多方面的论证,也包括反面的论证。兼听则明,我们应该多听听反面论证的意见。我认为,科研机关同一般宣传机关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科研机关除了宣传和论证党的方针政策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科学无禁区。科研机关应该唯真理是从,更富有创造性,更加无所畏惧。

总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有着极其远大而灿烂的前景,真如“不尽长江滚滚流”。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曾经明确地指出过,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样“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从来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到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可能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sup>①</sup>在马列主义的光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569—570页。



辉指导下,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和探索,仍然是摆在今天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国理论工作者真是任重而道远。这里我引用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达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今天的心境和方向可能是合适的。



## 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1982年8月22日在外国经济讨论会上的讲话

当前,我国正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无疑将进一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效益,以便为高速和讲求实效的发展打好基础,争取到本世纪末使生产翻两番,并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而在80年代这10年中,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系统的改革是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为此,我们不仅要认真总结我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而且要参考外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大体有三种模式。其中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南斯拉夫强调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计划管理;匈牙利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斯拉夫经济管理的某些经验,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这些不同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各有特点,各有利弊,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经济管理体制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涉及到生产关系,但也涉及到上层建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今天,我只想谈谈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问题和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 一、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存在着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作为其补充的个体所有制,因此,绝大部分产品在交换过程中都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就是说,除了全民所有制的一部分调拨产品和农村中作为粮食和燃料分配给农民的一部分产品外,其余产品的交换都采取商品的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全民所有制还不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之前,这种商品经济形式就将长期继续存在。

然而,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它必须是而且也有可能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与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完全可以自觉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得到妥善的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并构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内容。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通过市场机制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实现的。但由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在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形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生产起着全盘的决定性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却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对生产起着直接的调节作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可以起三种作用:一是直接的调节作用;二是通过经济杠杆起间接的调节作用;三是利



用经济核算起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现在先说第一种作用，即对生产的直接调节作用。

我们认为，在我国，对生产起直接调节作用（即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的范围，只限于不能纳入国家计划的小商品的自由生产和自由流通（包括个体生产，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计划外生产，以及为适应这种生产的需要而形成的自由市场）。在这里，生产完全以市场的供求为转移；市场是完全的买方市场。目前，对这种市场调节的作用，我们还不善于利用，而决不是用得过多的问题。只要我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它对活跃经济生活，满足群众需要，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就是说，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改变，这种小商品的自由生产和自由流通的范围，即所谓“市场调节”的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

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起的第二种作用，主要是通过运用与价值规律有联系的经济杠杆发挥对经济的部分的间接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与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直接、间接有关的经济杠杆（如价格、信贷、税收、利润、工资、补贴、汇价、储蓄、保险，等等）来管理经济，并对生产起一部分间接的调节作用。这种主要利用经济杠杆来实现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对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间接的调节，是为了更充分、更有效地实现国家计划的目标，以便使工农业生产更加符合市场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计划调节的一种方式。例如，国家根据市场的变动对价格进行调整，这当然是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的，但这种“官方调价”毕竟属于主观决策的范畴，是计划调节的一种手段。

多年来，我们只搞指令性计划，而没有实行指导性计划，不善于借助经济手段或经济杠杆来实现国家的计划。这是我国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的缺点。所谓指导性计划，就是有一部分计划任



务和指标只提示一个方向或轮廓，它必须结合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主要依靠经济杠杆来实现。这样做，就能使我们的计划经济搞得更灵活、更有效，使国家计划及时地得到修正和补充，从而更好地得到实现。而为了实行这种计划，我们则必须学会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学会以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前一阶段，我们的国家计划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善于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不善于以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足够地重视和善于利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实践证明，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与国家的计划管理并不矛盾，它是国家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国家计划的一项重要手段，特别是实现国家的指导性计划，更是离不开经济杠杆的正确运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除了仍然具有某些直接和间接调节生产的作用外，还有第三种作用，即推动国营和集体经济单位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它能促使劳动在各部门的合理分配，从而使商品的生产（包括商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与社会的需求协调一致；而且还表现在它能刺激企业开展适当竞争，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提高经济效益，以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力求趋于一致。毛主席所说的“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指的正是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被用于厉行经济核算，计算成本，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这是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实行的；也是当前整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过去我们不注意在这方面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很慢，今后应坚决扭转这种局面。

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为了在计划管理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包括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和推动生产的作用，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当前必须注意防止和纠正两种偏向。

前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界着重纠正了那种忽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忽视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张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好的,是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偏向,主要是在谈到市场机制时就忘记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不适当地夸大了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应当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并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在理论上过分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甚至认为计划指导是可有可无的,势必导致经济实践的混乱,损害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南斯拉夫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这有其好的一面。但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削弱了计划指导,也给它的经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年来,我们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使忽视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的观点有所克服,这是好的。但同时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似乎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都不该提了。大家知道,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除外)在经济改革中虽然都承认了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一定作用,并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及所有制的形式及其结构(最近保加利亚似乎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仍然坚持工商业中的单一国家所有制,仍然只实行指令性的计划,因此,它们计划外的小商品的自由生产和自由流通的范围极小。这就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只



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即所谓“计划市场”。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只能“根据人的意志而得到表现”，完全否定了市场的自发作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使客观的经济规律完全屈从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从而重新否定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特制是否定市场的作用。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并不是毫无影响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某些同志在谈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想到要继续以行政手段作为计划管理的唯一方法或主要方法，要重新限制企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适应性。这种观点我认为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曲解，是不利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四化建设的。

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曾经在长时期内，把交换关系即流通排除在生产关系之外。我们的商业工作，从基本上讲，实际上只做了统购统销和分配的工作，而忘掉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流通。说到底，我们还没有真正完成列宁所教导我们的任务：“要学会做生意。”我们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不是要排除市场的自发性，而是要把这种自发性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我们要搞计划经济，但问题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计划。国内外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不仅要有一定范围的指令性计划（或叫直接计划），而且要有利用经济杠杆来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或叫间接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反之，如果我们继续以行政手段作为计划管理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方法，而不学会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那我们的经济改革就会半途而废，甚至退回到老路上去。





## 二、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

所谓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领导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处理得当与否，关系到能否调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因此，它也是当前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所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必然要求集中和统一。没有集中和统一是决然搞不好社会主义经济的。但是，为了发挥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又必须适当地实行分权。这就是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如下诸方面的关系，我们才能建立起既能集中统一，又灵活多样的经济管理体制。

### （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必须坚持中央拥有集中的大权，但也应使地方享有一部分权力，以便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中央是统观全局的，举凡全国生产力的布局、农轻重的经济结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比例、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总方针、国家财政收支，都应由中央集中统一安排。除了这些方面外，则应实行“小权分散”，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力。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实行什么样的组织管理体制的问题。一般说来，按部门原则建立的组织管理体制，必然把权力集中在中央；而按地区原则建立组织管理体制，一般地则偏重于实行地区分权。从苏联、东欧国家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看，无论是实行部门管理还是实行地区管理，都容易出现割裂有机经济联系的现象，造成部门垄断或地区割据的局面。因此，除了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原则下，适当扩



大地方的权力外,更主要的是要打破条条(部门)、块块(地区)的束缚,形成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合理的经济联系网络。根据已取得的经验,似可设想以几个大城市为中心,组织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和流向的协作,发展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建立包括跨行业、跨地区的各种经济联合体。在这里,关键是不要把经济活动局限于行政区划或某一部门的范围内。这样,就能适当地减弱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使超出某一行政区划或某一部门的经济活动能比较顺畅地进行,并适当地实行分权管理。

## (二)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是集权与分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前,经济管理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特别是中央一级手里,而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的企业则几乎毫无自主权。国家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实行统一包干制,企业生产所需的物资由国家调拨,产品由国家包销,盈亏由国家负责,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近年来我们采取了一些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的措施,如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一定范围内推行间接计划,在一些小企业和服、饮食行业实行自负盈亏,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的管理权限。但是,从搞活经济的长远目标来看,我们给予企业的自主权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今后凡属企业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可考虑由企业自行决定;至于扩大再生产,则按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别给予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从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看,在扩大企业权限方面应着重注意的是实行责、权、利统一的问题,即扩大企业的权力必须与增加企业的经济责任同步进行。因为,如果只是扩大企业的管理权力,而不相应地增加企业的经济责任,企业就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对付国家的手段,损大公,肥小私,从而造成



经济上的混乱。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往往不得不把权力收回，重新恢复高度集权的管理。苏联、东欧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我们应引以为鉴戒。我们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收了又放，放了又收”的做法，以免人们对经济改革失去信心。

### (三) 企业领导者与职工群众的关系。

这是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主张在企业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决不意味着“厂长说了算”。厂长在全厂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党委领导下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委和厂长必须保证职工群众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使他们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有确定生产、参加管理、决定分配的权力。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这是涉及到所有制的性质的根本问题。如果职工群众（在农村是社员群众）的政治、经济民主得不到充分的实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不完全的，往往会变成实际上的书记、厂长、队长的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可能的。前年我到四川，在成都参观了一个机器制造厂。当我们提到扩大企业权限时，有两个劳动模范说，“再也不要提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了，我们这里厂长的权力已经够大的了，再扩大厂的自主权，我们工人连命都没有了！”这说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得不到发扬，必然会加剧企业领导与职工群众的矛盾，甚至引起企业性质的变化。当然，我们在强调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的同时，也必须强调企业、职工和社员都要有全局的观点，要使职工、社员所承担的义务与他们所享有的权力同时得到加强。

关于民主管理的原则，列宁曾作过详尽的论述，并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实践中作了初步的实施。斯大林时期，由于过分强调“一长制”的原则，削弱了民主管理制度，使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的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现在看来，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在企



业和经济组织内部建立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职工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给予职工和社员以选举、监督和罢免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原则就不能长期贯彻下去，劳动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甚至社会主义制度也会有蜕化变质的危险。

总之，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和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正在认真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上面，我仅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点极其粗浅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研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体制问题，一定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既看到它们的长处和成功的经验，又看到它们的缺点和严重教训。苏联从1965年起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来，力图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以改变畸形的经济结构；重视计划方法的改进，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市场机制的利用，特别是在计划制订中采取了一些带有科学成分的方法；以及各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都经过试验，步子比较稳当；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参考。但是，由于它坚持实行霸权主义，大搞扩军备战，财力和先进技术集中用于军需工业和与此有关的重工业，因此它对市场机制的利用，经济结构的改变，特别是集中管理制度的改革，都不可能跨出较大的步子。南斯拉夫的模式，我个人认为，它的比较彻底的民主（即他们所说的工人自治和社会主义自治）和较多地注意利用市场经济，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当然，对于它的缺点，特别是市场调节和分权过了头，注意计划和集中管理不够，我们必须避免。匈牙利的经验，特别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参考。但它终究是个小国，目前依赖国外较多，造成了许多困难，因此，我们对它的经验也不能盲目照搬。一



句话,我们的经济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必须在科学地总结自己 32 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的经验,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勇敢而又稳当地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将是一个巨大的、宝贵的贡献。



# 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和 对外开放政策不变

—— 1982年4月在美国费城“美中  
经济讨论会”上的讲稿

## 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因为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至今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属于第三世界,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有些人士看到中国现在实行经济调整改革,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个体所有制企业,学习外国企业科学管理方法,就说中国已经成为或者将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误解。还有些西方人士习惯于把中国同苏联放在一起,列入“东方国家”或“中央集权计划国家”,这也是错误的看法。中国政府多次庄严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它以后富强起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生产资料已归公有,剥削阶级和剥削关系已经消灭。社会生产力基本上得到了解放。1949—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1952—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1%。1979年,全国全民所



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 3,200 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 25 倍。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高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 二、曲折、起落的三十三年

新中国成立近 33 年来，国民经济经历着几起几落的曲折过程。1949—1957 年，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发展比较正常，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4.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2.6%，职工实际工资平均每年增长 5.5%，同时提前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8——1960 年 3 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增长 2.3 倍，轻工业只增长 47%，农业下降了 23%，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的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61 年起实行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到 1965 年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1966 年有所上升。但 1966 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0 年动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1976 年 10 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业生产 1977—1980 年持续上升。但是，我们对 10 年浩劫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认识不足，还是盲目追求高指标，1977 年特别是 1978 年提出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成套建设项目，国内大中型建设项目增加到一千多个。国家基本建设支出，从 1977 年的 300 亿元增加到 1978 年的 450 亿元。国民收入中积累所占的比例达到 36.5%。1979 年基建投资实际数额增加到 500 亿元。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又趋严重。

32 年来，我国经济所以发生这样大起大落、遭受严重挫折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指导思想犯了脱离实际、违反社会主义经



济规律的严重“左”倾错误。例如，我们曾经不善于利用甚至违反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我国国情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盲目提高所有制的形式，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了生产力。又如，人民政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但是，我们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政治运动，削弱了经济建设。再如，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要求，不断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却过分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基金的比例，压低消费基金的比例；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轻视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忽视人民衣、食、住、行问题的解决，忽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句话，忽视长远的和当前的社会需要。

我们曾经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当，不善于在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搞活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仍然发生巨大作用。但我们曾经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发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不重视流通环节的建设，忽视企业经济核算，结果就使国民经济搞得很死，经济效益很低。

### 三、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

1978年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努力，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工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增长。





但是，由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克服，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消费品生产还是上不去，市场供应紧张，通货和信贷膨胀，财政出现巨额赤字。这样，就使我国经济潜伏着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和人民下最大决心，着手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81年从原计划的500亿元，压缩到380亿元。停建和缓建一些项目，保证一些最必要的项目和职工住宅的建筑。

其次，着重调整产业结构。真正贯彻优先发展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和轻纺工业，同时大力加强燃料工业、交通运输业。扭转重工业，首先是机械工业为生产而生产、为自我服务的偏向，转到为农业和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

经过2年调整，我们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1979年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8.6%；1980年受到严重自然灾害，还比丰产的1979年增产2.7%。1981年粮食总产量接近1979年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1980年，棉花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去年又有新的突破。油料连续3年大增产，1981年又增产17%左右。1979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5%，其中重工业增长7.7%，轻工业增长9.5%，超过了重工业。198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8.7%，其中轻工业增长高达18.4%，大大超过重工业的增长率1.4%。1981年轻纺工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12%，又远远超过重工业。

最后，我们正着手调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以往几年，我国积累率都超过30%，这显然过高。现在我们力求把它调整到25%甚至更低一点。25%的积累率已经超过美国和西欧各国。我前年访美时，朋友们很关心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初步统计，1979—1981年的3年间，国家用于增加城乡人民收入



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已达1,400多亿元，占这3年国家财政收入31%，比例之大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在3年中，我们已在城乡陆续安排就业2,600万人；新建城市职工和居民住宅2.2亿平方米。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14元，增加到1981年的772元，增长25.7%。3年来城乡人民的实际购买力（扣除零售物价上涨因素）增长43%。

我们坚决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这一条根本方针。一面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必须拿出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投入建设，不断扩大再生产，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等到我国调整工作基本完成，1985年以后经济更加健康增长以后，积累率就有可能逐步有所提高。

目前我国经济工作是以调整为中心。但是，调整必须和改革、整顿、提高相配合，相辅相成。改革、整顿和提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调整。但是，不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整顿和提高，调整也不能顺利进行，收不到预期效果。

当前，改革、整顿和提高的重点是改革经济体制，整顿经济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其总的目标就是提高经济效益，符合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克服过去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病，正确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革的关键是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包括一部分财权、人权、分配权）和充分发扬职工和农村社员的政治经济民主。

3年来，我国政府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合乎国情，顺乎民心，效果十分显著。我国农村从1958年以来，实行政社合一，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力求所谓“一大二公”。这种管理体制不完全符合当前农村生产力的状况，便于滋长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不利于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发挥。3



年来,全国大部分农村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各地不同情况,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和群众志愿的基础上,改变经营管理制度,采取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如包产到户,联产到劳,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等),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可喜的变化。许多穷队一季翻身,一年大变。富队变得更富。科学种田效果显著。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年收入几千元的农户成批涌现,一排排的新瓦房平地升起,集市上人山人海,购销两旺,许多农民家里有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甚至洗衣机、电视机,农民存款大增。整个农村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大好形势。

我国总理赵紫阳指出:“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政策主要是联产责任制。发展工业,也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政策主要是实行经济责任制。”近2年来,不少企业实行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工业交通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使企业迅速得到改造,提高经济效益的最有效的办法。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利润分成、利润包干、自负盈亏、以税代利(润)、计件工资、优质奖金、岗位补贴、满勤奖等等。所有这些形式和定额指标,要因地、因厂、甚至因车间、工种制宜,不要“一刀切”,根据群众经验和意见,逐步完善。各地实行经济责任制后,收效一般很好。四川重庆市的冶金局过去9年连续亏损,1980年这个局所属企业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规定全年上缴国家360万元利润作为包干任务,超收的企业可以提留一部分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结果这个局当年就扭亏为盈,全年赢利1,175万元,其中上缴国家466万元,比包干任务增加29.4%。

改革经济体制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正确落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但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同时还存在着少量的个体所有制作为必要的补充。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长期地存在着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应该根据价值规律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应该适应社会的市场的需要。它的流通，不问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除一部分物资按照规定价格由国家调拨（按成本计算）外，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计划所要求的充分灵活的调节，真正做到产需结合，产销结合。它的分配应按照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通过货币和商品形态，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包括奖金、补贴在内。这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辅助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我们保护和鼓励计划指导下的适当合理的竞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这种竞争对经济有破坏性作用），打破那种“吃大锅饭”、“铁饭碗”式的包办垄断局面。而这种适当合理的竞争将能大大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厉行经济核算，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提高经济效益。

在这种体制下，我们逐步打破那种“划地为牢”和行会式的按行政区域和部门来管辖的制度，按照计划，实行全国一盘棋。同时，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协作和联合。组织这样的协作联合，将更有利于发挥各地区、各行业和各单位的优势，扬长避短，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

整顿的重点是分批分期地搞好企业的全面整顿。经济管理，要善于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建立和健全经济立法。企业管理应严格实行经济责任制，厉行经济核算，充分发扬职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逐步实行企业各级行政领导人员由职工大会民主选举和罢免的制度。特别重要的是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这是整顿企



业管理的关键。同时应认真实行定员定额,把多余的职工调出来,轮训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当前提高的内容,主要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产品质量。一句话,要提高经济效益。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对原有企业着重挖掘潜力,大搞技术改革和革新,加强劳动纪律,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逐步增设技术密集型企业。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每个企业都要力求产销对路,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适应国内市场需要,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里的关键是在增进职工物质利益的同时,大大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职工觉悟。

#### 四、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贯努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打破各种封锁和障碍,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大力学习外国的长处,对外实行开放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这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教导,也是我国政府奉行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决不会改变。10年动乱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处于闭关锁国的不正常状态。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我国的国际交往大大增强。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实现我国四化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对外总方针下,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大大发展了。目前我国已同世界上17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往来。这首先表现在中美的经济关系上。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中美贸易有了大的突破,两国贸易额已经连年超过美苏贸易额。中美其它方面的经济技术合



作和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中国同日本、西欧、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都在稳步发展。

为了加速我国实现现代化，我们要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关于利用外资，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如偿付能力和国内配套），贯彻积极利用，稳步前进的方针。我们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等多种方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外资来勘探、开发我国的丰富资源，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关于引进技术，我们正结合我国现有的基础和消化能力，以引进中间性的适用技术为主，同时适量地引进尖端技术。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将不再着重引进成套设备，而以引进关键性部件和专利、软件为主。我们反对用整套搬进的办法，而主张在学习和仿制中有所改进，有所创新。我们正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和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工作。

有些朋友担心我国政局能否长期稳定，政策能否保持连续性。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这个事实：从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我国已经确立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巩固了。因此，在国内政局的稳定程度这一点上，我想朋友们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我国比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国毫不逊色，而且我们将会越来越稳定。它的基本原因是：3年来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心愿的。这些方针政策，将坚持贯彻执行，并将随着新情况的出现，继续有所发展。

还有朋友担心，我国实行经济调整，压缩基建，减慢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将使中国经济萎缩，对外经济关系不会有大的发展。事实将证明这种担心缺乏根据。我们今后几年的调整，正是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经济健康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我国经济越壮大，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将越加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将越加向广



度和深度前进。

我国当前的经济调整和对外开放政策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和产物。我们将坚持我国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将坚决贯彻执行赵紫阳总理在1981年年底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提出的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以期在本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化，把我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我想，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符合世界人民、首先是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的。



# 认真改进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1980年4月3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  
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

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已有近30年的历史。尽管经过多次波折，但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总的来说，30年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我国经济经受了10年内乱之后，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满怀信心地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总结过去的经验。

从国际范围来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但还处于少年时代，需要继续探索前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寻找它们各自不同的道路曲折前进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几千年剥削阶级统治的废墟上，建设没有剥削制度、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史无前例的，无章可循的，因此更需要进行长期的创造性的探索和追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30年，受到一些挫折，是由于缺乏经验，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严重的“左”倾错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要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正确方针，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态度自觉地全面地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胜利前进的。

二、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斯大林在1952年明确地指出了这条基本规律。他在他的重要著作《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方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sup>①</sup>我认为斯大林所表述的这条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根据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我建议把它稍加补充，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如下的表述：“在扩大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用先进科学技术积极地武装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特别是发展商品生产，畅通流通渠道，坚持按劳分配，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表述对不对，请大家考虑指正。我们制定长期计划，必须体现这个基本规律的全部内容和各个环节。

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结合本国的实际，走中国式的道路。在制订计划和进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必须遵循以下几条主要规律：

1、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和运动状况。生产关系改变得太快，就会犯“左”的错误；如果太慢就会犯右的错误。例如，我国实行三大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恐怕是过快了。再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不适应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经济基础的，实践证明它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2、要不断发展和巩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律。但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经济部门，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和人民群

---

<sup>①</sup>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1页。



众的觉悟程度密切相关的。集体所有制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所谓穷过渡)容易损害群众的积极性,这方面我们曾吃过大亏。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保留少量的个体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活跃经济生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而起变化,越来越利于公有制的扩大和巩固。

3、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的计划经济。

4、要十分重视利用价值规律。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生产(包括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基本上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构成独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剥削剩余价值即利润),它总是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来完善我们的生产(如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等)和流通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用意就在这里。

5、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封建主义是按地权和权势分配,资本主义是按资本分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按劳分配,做到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缺劳保障其生活。社会主义必须严格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平均主义、铁饭碗、大锅饭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因为它们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穷社会主义”的纲领。

6、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逐步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



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确定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时,不能先考虑或者只考虑中间产品(如钢、机器等),而应该首先考虑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包括衣、食、住、行、用、文教、科学、卫生等)。

四、长期计划必须体现上述规律,使之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首先要研究和制定一个适合国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又要照顾到 80 年代、90 年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大体发展趋势。长期规划的内容包括国土整治、控制人口、工农业生产、就业、工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物价、信贷、能源、交通运输、教育、科学、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经济法等。

#### 五、当前需要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1、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要纠正那种只有生产才是积极因素,消费是消极因素的错误观点。消费是生产的因素之一,衣、食、住、用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教育科学是劳动力更高级的再生产。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通过教育,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更能掌握先进技术、更有管理能力。通过改善生活,加上政治思想工作,使劳动者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过去 20 年来,积累率偏高,对消费注意不够,效果不好。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积累率一般不超过 25%,这是很好的。资金积累要用得恰当,基本建设战线要大大缩短,集中力量搞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其余着重搞现有三十多万企业的技术改造。

2、决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实事求是,从我国的实际可能和需要出发,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速度不要带水分,要求有经济实效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要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相适应。勒紧裤带的速度一般说来是军国主义的速度,不是社会主义的速度。

3、在经济结构上,要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和服务行业,由原来的农、轻、重,变为农 轻、服、重。不注意发展衣、食、住、行等服



务行业,就是对人民生活重视不够,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重视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最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对个体小企业和服务业予以大力发展,收效很好,值得借鉴。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根据我国人口多,要求就业面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的特点,要特别注意“适用”两个字,不一定非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不可,可以高、中、低(略高于我们的)并举,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并举,逐步由劳动密集过渡到技术密集。引进先进设备,不在多,重在用、改、创,着重引进软件和专利。在这方面,日本人的引进、改进、创新、输出的整套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4、计划与市场调节。一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但是,因为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是必要的,所以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农业主要产品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指标外,大量的小商品可以由企业自由生产、自由交换,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实行自发的调节。此外还应当注意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储蓄、保险等经济杠杆,实现指导性的计划指标。这样,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可以逐步作到统(计划)而不死,活(市场调节)而不乱。

5、科学教育在长期计划中比重一定要加大。和国外比较,我们在这方面太落后了,甚至比印度还落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不提高,不进步,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教育制度要改革。要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和彻底扫除文盲。除正规学校外,要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要着重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各级教育都要着重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要大力注意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反对只重死背死



记的填鸭式教育。注意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适当结合。

6、建议计划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力进行改革：

①计划工作要把人民的需要(全国范围内再加上出口和国防)作为出发点,从人民的衣、食、住、行、用、教育、科学、卫生等各方面进行预测,先拟定社会需要的最终产品的各项指标,再根据这些需要拟定中间产品的指标。

②要把长期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结合起来,以长期计划为基础,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目标要力求全面和完整些。建议国家计委的工作重点放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定长期计划方面。

③制订计划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要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多次上下反复,使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在工作中,要吸收有关的经济和技术专家和群众的代表,倾听他们提出的意见、问题、困难和愿望。对重要专题和重大项目必须经过周密调查和反复论证。

④计划方法要进一步现代化,要吸收当代的投入产出法、运筹法、系统工程学、计量经济学和未来学等有用的部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的计算,而不是靠拍脑袋出指标和定项目。在这方面,苏联、法国、日本等国都有许多先进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建议由国家计委组织研究班,对计划工作人员进行普遍轮训。

⑤计委应吸收专家、群众代表(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代表)作为委员,并使他们在职有权。建议国家计委增设世界经济研究室,或在计委经济研究所内加强世界经济室,及时研究和吸取国外有关计划经济的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应用到我们的计划工作中去。

六、我想对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市的经济发展规划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主要的文化中心。全国解放时，我们提出消费城市应当改变为生产城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北京无论如何首先应当发挥它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和优势。它应当成为文物荟萃、环境优美、交通方便、供应丰富、秩序优良的社会主义模范城市，使中外人士来到北京，就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显出我们既是文明古国，又具有现代科学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宏伟气概。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还缺乏比较完备的长期规划，特别缺乏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方针。在北京，重工业再不宜添建，污染和耗能过多的轻纺工业也不宜多建，栽草植树和街心公园要普遍提倡，服务行业要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服务态度和清洁卫生要大大改善。城市建设一定要服从总体规划和标准设计，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区都不能各自为政。北京市应该在郊区逐步建立若干环境优美，有良好物质文化设施的卫星城镇，适当分散人口。总之，要把北京真正建设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壮丽的首都，成为国际交往和国际会议人心所向的场所。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它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良好的港口，又是文化科学中心。我认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应是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海应该以它的优越技术和较好的管理经验传播和支援全国，全国也应尽其所能支援上海。可以考虑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建立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经济区。上海的经济力量日益雄厚，全国通过它扩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来往，使它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之一。

天津具有自己的工业、水陆交通和文化科学的优势。它应当面向华北、西北、面向国际市场。也可以考虑以天津为中心，逐步建立华北、内蒙各省区的经济区，建立许多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



企业。天津的经济实力随之日益雄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其他沿海城市，如大连、青岛、广州等等都应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起带动内地、面向国外，把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结合起来，以壮大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世界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这些设想不一定切合实际，谨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 当好全国经济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先驱

——1981年5至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  
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 一、试办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

(1981年5月29日的发言)

### 1、设置经济特区是否合乎我国国情？

全世界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定的优势，用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特区，在不同社会制度和国情的国家中，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收到了效果。

我国的国情是地大物博，10亿人口、8亿农民，底子薄，资金不足，文化技术落后；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状况，生产关系要自觉地调整、改革，以适应生产力较快发展的需要。而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沿海接近港、澳、台湾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劳力和原材料比较便宜、华侨关系特别多。因此，试办经济特区，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为了更加大胆地利用外资、侨资，改进经营管理，引进先进技术，使工农业生产更快发展，经济搞得更活，群众生活更快改善。两省和特区2年来实行这种政策和措施以后的经济效果总的说来是好的。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两省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国情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点首先应当肯定。当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还难免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有待于我们及时总结经验，逐步加以克服和解决。

## 2、试办特区有没有理论根据？

我认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搞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的基本指导思想。当然，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还需要根据实践来加以检验和发展。

3、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是不是后退？有没有回到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危险？

我们的答复是：否！不是后退，没有这种危险。今天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实行特殊政策，搞一点国家资本主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一点外资、侨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会大大促进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这是从根本上大踏步前进，决不是什么后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也决不会后退。

当然，利用外资我们必须付给资本家一点利润，就是说，要向他们缴纳一点贡税。那情况会怎么样呢？列宁很好地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地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缴纳这种贡税对我们是有利的”<sup>①</sup>。何况我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大中型工业和服务行业。

在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们利用一点外资，决没有回到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地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548页。



位的危险。列宁说过：“邀请资本家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sup>①</sup>我国经过31年建设，情况比当时俄国好得多，因此更没有怕的理由。

4、在我们的经济特区里是多种经济并存：有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可能国家资本主义成份占相当优势。但这并不可怕。由于全国和全省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导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特区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必然由社会主义经济所支配。

5、有人担心我们搞特殊政策，会使广州港澳化。我们说，不会。我们搞经济特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维护和巩固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其结果必然是我们影响港、澳，而决不是现有的港、澳情况扩大到广州市和广东省。当然，我们扩大同港、澳的联系，扩大同外资的关系，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必须进行反腐败的斗争。这一点也决不能忽视。

6、两省搞特殊政策，办经济特区对全国四化建设将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在两省和特区可以较多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适用的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这里为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全国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并且以这里作为试点，为全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提供较好的经验，提供学会同外国人做生意、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经验。我们这样做，如果收到预期的成效，就会有力地影响台湾省上下的观感，极大地有利于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同时可以扩大国际影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0页。



响,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二、做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先驱和排头兵

(1981年6月12日的发言)

1、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着重从理论上和战略上加以阐明。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实践,还处在少年时期。从十月革命算起,64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经验还很不丰富,基本成功的经验有,但不那么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只是得到初步的实现,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另一面,在国际范围内,包括我国在内,严重的反面教训却不少。这些反面教训,在一部分进步人士中,曾经产生了信仰危机,有一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优胜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国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并且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如果中国能走出一条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的路子,创造出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来,那将对全人类作出极大贡献,将对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事业起伟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搞了六十多年,主要模式有两个:一是苏联模式,一是南斯拉夫模式。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苏联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单一指令性计划,重、轻、农序列的经济结构,高积累,低消费,缺乏民主。这在苏联处于四面楚歌、资本主义包围时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它的缺点也不少。毛泽东同志



在1956年对此曾作过中肯的批评。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后来发展为社会主义自治,有较高的民主,更大的分权,中央权力较小,各民族邦权力大,注意计划性较差。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点和缺点,问题都很多。匈牙利经济改革,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有较好的成效。但因国家太小,对外依赖过多,也遇到许多困难。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模式。这三个国家尽管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大量利用外资,大胆请外国专家,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毛主席在50年代虽然指出这种体制的缺点,但实践上并没有加以纠正。相反,从1957年以后,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左”的错误扩大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运动压倒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种情况,到10年内乱时期达到了顶点。

30年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是“左”,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它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认识或不充分认识人类历史上每个社会形态都不曾是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们一般地都包含着旧社会的残余和新社会的萌芽。奴隶社会包含着原始社会的痕迹,封建社会包含着奴隶制的痕迹,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因为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sup>①</sup>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经济方面除了在按劳分配问题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权利之外,还有商品货币关系,还有少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量的个体经济,等等。它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服务,起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作用。

第二,不认识或不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常常错误地把商品生产和交换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至少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没有认识清楚,或认识得不大清楚。这条规律的基本要求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其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 and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对这条规律认识不清的必然的后果是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革新不够,特别是人民生活改善很差,从而极大地影响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不了解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容易造成缺乏民主和官僚主义,而且带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民主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决然难以发挥。

2、彻底清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基本环节。

所谓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利用两省和特区的地理优势,比其它省、市、自治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大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更加洋为中用,更加资(资本主义)为社(社会主义)用。所谓资为社用,就是大胆吸收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资本主义科学管理方法,办好国营的、合营的以至外资独营的企业,大力发展生产。二是给两省和经济特区以较大的自主权,包括人权、财权、地方立法权等,在两省和特区范围内经济政策更放宽



一些。同时要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在试验。两省扩大了自主权，要看看如何才能最好地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全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在用人上要尊重专家，专职专用，发挥他们的特长。过去错划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白专道路”分子，以及属于其他冤、假、错案的人，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有不少人是很很有才干的。现在，有不少省、市、自治区，思想还不够解放，还不敢用这些人。建议你们两省大胆择优使用，千万不要让计算机专家去分房子，让化学专家去当收发员，也不要让他们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妨碍他们发挥专长。

在特区搞经济，搞法上要更灵活，机构一定要精简，要轻装上阵，上面千条线，下面只要几根绳就够了。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善于利用价值规律，逐步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顺畅各种经济渠道，特别是流通渠道。无论条条还是块块都要服从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用一定的行政方法，但千万不要迷信行政方法，要学会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管理经济。要工农贸合一，产销结合；要更大胆地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制度；要在工商行政的管理下，保护合理的竞争，适当地发展这种竞争。这是降低成本、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建议要除“五怕”：

第一，不要怕出乱子。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多地实行对外开放，因为没有经验，不免出点小乱子。当然，我们要力求不要出乱子，更不要出大乱子，特别注意防止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行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应坚决打击。但是决不要因噎废食，怕这怕那，影响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决心。

第二，不要怕资本主义。列宁说过，“向世界资产阶级缴纳一



种贡税；……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地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缴纳这种贡税对我们是有利的。”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有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只要善于资为社用，就没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

第三，不要怕先富。不平衡发展是绝对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贫穷饥饿，我们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第四，不要怕冲击。有人认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会冲击其他省、市、自治区。我看对冲击要做具体分析，有的冲击可能打击其他省、市、自治区经济（例如廉价收购其他省、市、自治区产品，高价出口，等），这些两省要注意防止，要有高度全局观点，决不要以邻为壑。但是，有的冲击（如要求更多的花色品种和高质量的产品，按照合理的合同出口，等）有可能刺激它们改进工作，促进其它省、市、自治区以更高的效率发展经济。

第五，不要怕犯错误。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都是新生事物，很难不犯一点错误。当然要力求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就及时总结，改正错误，工作就进步了。

3、两省要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先驱和排头兵，先行一步。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管理和技术改造、科学办企业、培养人才等方面，敢于突破。要敢于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权力，当然也不要滥用这种权力。要敢于突破条条块块给予不适应两省情况的框框，当然如有改变，应向中央及时请示报告。要放长线钓大鱼，不惜亏小本赚大钱，千方百计利用外资、侨资，除特殊情况外，不要向中央伸手。昨天项南同志讲了一个权，一个钱，权要向中央去争，钱要向国外去争。要不惜出高额学费，不惜“牺牲”，纳点“贡税”，向西方资产阶级好好学会作生意，学会经营管理。要敢于创



新,敢于冲破种种阻力,包括思想上、人事上、物质上的各种阻力和困难。当然,要同有关方面充分协商,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

所谓前驱、排头兵,就是带头人,就是模范。先行一步就是说,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以后都要结合各地的实际跟着走。所以两省应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要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模范,要作洋为中用,资为社用的模范;要作照顾全局、艰苦奋斗的模范。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坚决反对和打击走私贩私和贪污受贿。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尽可能不吃小灶,不吃偏食,不贪不必要的优惠。否则,就不可能在全国普遍推行,失去促进全国改革体制、实现“四化”的排头兵和前驱的作用。

4、建议中央各部委对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积极支持,大力协助,要“高抬贵手”,尽可能给两省以方便;要“刀下留情”,决不要对两省视同其它省、市、自治区一样,搞一刀切,要看到广东、福建两省这里有个“特”字。各部门自己有什么改革的打算,建议主动提请两省先作试验。把两省作为自己的试验基地,岂不很好?要充分相信他们。党中央信得过两省领导班子,他们一不是卡林顿,二不是蒋经国,他们是优秀的党员和领导人。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放开双手让他们干。让他们在经济上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行,真正做全国经济调整、改革的“先驱”和“排头兵”。希望两省和特区同志随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我们相信两省同志对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





## 略谈实行对外开放、合理 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

——1982年6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  
“宪法修改草案”讨论会上的发言

五届人大常委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根据我国革命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方针下，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它比1954年、1975年、1978年三部宪法好得多。我完全同意这部宪法草案的各项规定。

现在我只就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合理利用外资问题，简略讲一点理论上的依据。

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以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外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学习外国长处，经济上对外开放政策。

宪法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同时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它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这一条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

在现代，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



早在一百多年前曾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没有完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生产还占极大优势，同时帝国主义对苏联实行严密封锁和包围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包括实行租让制和组织合作社，来战胜小生产自发势力。列宁指出“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下了正式的书面合同，”“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们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们愿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普通利润的超额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内增加产品数量。”<sup>①</sup>列宁还说，“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人力生产。”<sup>②</sup>“恰当而审慎地进行租让政策，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一定的不大的程度内）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sup>③</sup>

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搞合营企业，比起当时的苏联来，无论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都要好得多。但是，国内还有人怀疑这一政策的正确性。这是经济战线上“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残余影响的一个侧面的反映。他们总怕吃亏，怕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或者片面地理解自力更生的概念，把它同争取外援对立起来。

<sup>①②</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7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7页。



不错,利用外资搞合营,我们总要吃点亏。列宁早就说过,外国资本家来搞合营,目的是获取超额利润。他更明确地指出,搞租让,我们“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sup>①</sup>“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款’,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但是“同时我们却立刻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地位和改善我们经营的条件的一定的办法。”<sup>②</sup>我们可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来增加生产,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列宁的这些意见,对于今天中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都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中国,引进外资搞合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等,有人担心它会带来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对于这一点,列宁于1921年4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说:“邀请资本家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sup>③</sup>“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危险的,而产品的增加却会使工农得到好处。”<sup>④</sup>在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新中国,利用一点外资,搞一点资本主义,难道会使“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恢复?会使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复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比列宁在当时更加有把握地说:没有这个危险!尽管会付出些代价,但它们将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有人片面地理解自力更生的意义,把它解释为与世隔绝、闭关锁国、自给自足,把它同对外开放政策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封建小生产的思想。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时,曾经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8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0页。



正确地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同别的国家断绝经济往来，必须建立广泛的国际经济关系。我们在10年内乱时期，曾经吃过闭关锁国的苦头，它极大地拉大了我国同科学技术和经济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的距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正如宪法草案规定的，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合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科学管理方法，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根本任务，也正是为了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力量。所以，对外开放，争取外援，正是和自力更生相辅相成的，决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我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大，我们扩大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往来，参加国际分工的可能性便越大，我们对人类的贡献也将越大。

当然，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外国资本，必须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为前提。我们决不容许国际资本丝毫侵犯我国的主权，违反我国的法律和法令。列宁在讲租让制的时候，曾说过：“租让是一种租赁合同。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承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sup>①</sup>列宁还讲实行租让制，无产阶级必须“恰当而审慎”从事。他还说：“租让制这个任务的全部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sup>②</sup>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时候，也必须慎重其事，决不可掉以轻心，防止上当受骗。宪法草案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8页。



# 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 大搞社会主义

——1979年11月在中华农学会会议上的讲话

## 一、对当前我国农村形势的估计

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是不是很好？我的回答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好，而且趋向于根本性的好转，这是主流。以此为基础，将带来全国更加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更加大好的局面。另一句话：问题和困难还很多。农业连年大丰收，农民基本上可以吃饱穿暖，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逐渐提高，农民家里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以至电视机、洗衣机等不断地多起来。农村新住宅一片片平地兴起。这些情况同当年困难时期，特别是10年动乱时期相比，那当然好得不知多少了。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我们要认真地作调查研究，去了解 and 发现当前农村中还存在着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同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还存在着什么差距。我们永远要抱着满腔的热情，保持清醒的头脑，去看待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看待当前的农村工作。

导致我国农村形势好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央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我们搞好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是完全正确的。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使我国农村形势转向大好的根本保证。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具有多层次的状况，在保持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前



提下,采取各种形式的为群众乐于接受的生产责任制,是十分得人心的,是近年来使我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一项最重要的政策。此外,农业科学技术的逐步推广普及,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适当提高,也是促使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

那么,当前中国农村还存在着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呢?对此,我建议大家去作一些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和困难确实还很多。比如说,在实行这些责任制的地方就发生了一大堆新问题和困难。例如,怎样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的残余,减少推广生产责任制的阻力?怎样不断根据农民的志愿完善生产责任制,而决不走回头路?怎样维护和巩固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怎样加强农村政治思想教育,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怎样适应新情况,更好地实行科学种田,保持和继续发展农业机械化?集体怎样坚持水利建设,合作医疗和普及教育?怎样既不放松粮食增产,又要注意发展多种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原来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否适宜?怎么改为好?干部的思想动向怎样?怎样保证和诱导他们更好地做好工作?社队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办?农村农工商联合企业应该怎样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认真调查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问题。

## 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在农村中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社员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或者说,在我们的农村工作中真正实行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即群众路线的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地解决,8亿农民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生产



和一切工作就很难搞好，上面所说的一切问题也就难于正确地得到解决。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是否已经真正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按理说，他们早已应该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了。因为在我国，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国家的政权已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适应我国国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一个国家，工农劳动人民，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内，当然是国家的主人了。这样一种崇高的庄严的主人翁地位，是由我国亿万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英勇牺牲、艰苦奋斗争取得来的，不是轻易得来的，更不是任何人恩赐的。

那么，我国8亿农民是否已经真正获得了他们的主人翁权力了呢？我说，获得了一部分，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农民当家作主的情况，在解放初期，比较正常，特别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瞎指挥，一平二调盛行，农民积极性受到挫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革命干部和广大社员沦为“全面专政”即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对象，农民群众从主人翁的地位降到了奴隶的地位。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的农村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农村基层组织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特别是联产到劳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一些省、市、自治区逐步得到了推广，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活跃了市场，改善了农民生活，农村面貌为之一新。这个基本事实必须充分肯定。这是今天我国农村生活的主流。但同时必须指出，我们的农村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这里最重要的一条，我认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和确立。也就是说，农村



社员群众还没有充分享有政治经济的民主权利。在今天的我国广大农村，什么问题都由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一人作主，说了算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有些生产队规定了奖罚制度，甚至同专业组和社员已经签订了奖罚合同，到生产有了优异成绩，生产队长为了向上多报产量产值，为自己表功，便把奖罚合同“象抹桌子一样轻易地抹掉了。”有些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侵占集体耕地为自己添筑新居，群众非常不满，但不敢吭声，如有异议，便给穿小鞋，打击报复，甚至造成冤案。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负责人，多数由上面指定，有的虽然经过选举，也只是形式主义地走过场。为广大社员群众所极端不满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负责人，群众无权罢免和撤换。

上述这些以及还有许多更加严重的不民主的情况，在我国国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曾经存在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它的残余，特别是思想领域里的残余，并没有也决不可能因为封建生产关系的消灭(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而一下子消灭。相反，它将长期地残存着，由死人吞噬着活人。加上我国并没有经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只有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历程，在那里，人民并没有过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而只是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专制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和镇压。当然，我们党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从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回顾我们党成立后六十多年的革命史，每当我国革命和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失败的时候，总有一种以家长制为特点的错误扰乱我们的党和国家，如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立三错误、王明左倾错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966—1976年整整10年大动乱时期，也是这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尤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中央着重抓了改进党和国家的领导作风这一极为重





要的问题,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封建家长制的阴魂不会轻易消散。如果我们对它不加警惕,不进行坚决恰当的斗争,它就会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死灰复燃起来,继续凶残地吞噬着活人。目前各级领导,包括农村基层领导中存在着的非民主,一言堂作风,就是这种残余影响的表现。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极坏的作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做到:

第一,扩大社队的自主权。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自主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要真正做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一级组织和任何个人不得随便占用或平调。要批判那种越大越公就越好的错误思想。二是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公社、大队,特别是生产队,对种植的作物和面积,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以及农工商联合企业的举办等等经济计划和活动都应享有决定权,上级不得随便干预。三是产品分配权。公社、大队、首先是生产队,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征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对产品的分配享有完全的决定权,上级组织不得随便平调。生产队对社员的产品分配必须严格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劳动好的先富起来,提倡专业户、重点户,提倡劳动致富是光荣。国家对穷队要扶持,集体对困难户要照顾。这两个方面(按劳分配和照顾困难户)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有人说,按劳分配是旧社会的痕迹。我们说,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按资(本)分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按权按地分配。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全盘地实行按劳分配。当然,等到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时按需分配就将取代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便成为旧时代的痕迹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最严格最认真地实行按劳分配,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丧失劳动力的确保其生活。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平



均主义，而农民在他没有提高觉悟之前是最喜欢平均主义的。

第二，在政治上，必须保证社员群众对社、队干部有通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聘任、罢免和批评监督的权利，对社队业务有参加管理的权利。这是农民群众最起码和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也是他们最切身的民主权利，必须绝对地予以保证。农民群众能否真正当家作主，主要的标志也就在这里。应该了解，我国农民能够享有这种权利，是以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述民主权利是根本谈不到的。这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标志。

第三，为了更好地保证社员充分享有民主权利，保证社队各项经济事业和行政管理进行得更加有效，我国基层组织的体制应当作必要的改革。我个人认为，我们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并不适合当前我国的国情。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种体制弊多利少。它是极左指导思想的产物。这种错误指导思想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决定一切。它否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经济建设已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它认为经济工作如同其它工作一样，必须搞群众运动，而且一切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它实际上否认经济建设必须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在必要的行政手段之外，着重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办事。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政社合一的体制既不利于乡村政权工作的建设，更不利于农村经济事业的建设。以党代政，以行政命令代替生动灵活的经济措施，严重地影响了基层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时，在封建意识形态还有相当残余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更为家长制和官僚主义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赞成及早结束政社合一的体制，改为政社分开的体制。政，应该恢复乡一级的政权组织；一切行政法律事务，统归



乡政府管。今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纯属经济(企业)组织,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队长负责制。社长、队长统由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他们根据民主集中制,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生产和一切经济业务。这样政企既分开,又合作,政权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可以搞得更有秩序,更有效率。党也将发挥更加有效的领导作用。

我国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也就是实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是真民主,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那种假民主。当然,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假的,但是它假得相当认真,它比封建专政确实进了一大步。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因为我们直到现在还没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善,而在漫长的10年动乱时期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又经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严重摧残和迫害,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对我国一部分人还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和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欺骗性。列宁早已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sup>①</sup>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阶级只是被雇佣的奴隶,因此所谓民主和自由实际上只能由少数财主们独占,广大劳动人民只能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民主权利,只能有贫困和饥饿的自由,当现代雇佣奴隶的自由。资产阶级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制度不受伤害,不致夭折,便赐给劳动人民一点点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其真正目的无非是欺骗劳动人民,让他们祖祖辈辈安分守己,屈服贴贴永远当财主们的奴隶。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生产资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5页。



料已归公有,人民真正成了国土和全部财富的主人,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就有享受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的一切条件和可能。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sup>①</sup>随着封建主义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的逐步克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日趋完善,随着劳动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人民享受这种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的可能便将成为现实。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一些重要的正面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我们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享有最大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里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里的民主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集中指导的民主,就会走向极端民主化,走向无组织无纪律,走向散漫和无政府状态。这些都只能适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违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旧中国一方面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封建主义的专制、宗派、行会思想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的散漫、保守、狭隘、无组织、无纪律思想一般占优势地位。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长期以来同这些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用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农民已经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回自己的土地,并进一步胜利地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土地和大生产资料转归集体所有,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但是这种经济的即生产关系的改造,并不能很快带来小生产者思想的彻底克服。因此,我们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农民真正当家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页。



作主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对民主的集中指导,防止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有害倾向。

这个集中指导的最中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二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三是按劳分配,四是对外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失去对上述社会主义社会四大特征的基本保证。现在我国农村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对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决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变。这一点,我们在指导思想必须十分明确坚定,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动摇。其次,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为了搞活经济,使国家计划完成得更好,我们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用市场调节作为辅助手段。我们在发扬农民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时候,首先要强调农民经营生产和分配产品必须服从国家计划,然后,按照计划规定的任务,结合当地的实际,安排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交售各种产品。最后,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一面坚决反对某些干部只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置社员死活于不顾的错误偏向。要提倡劳动致富,让一部分劳动好、有专长的农民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要防止和纠正那种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缺乏全局观点,由社员分光吃光的错误做法。大河不满小河干嘛!国家和集体穷了,社员个人哪里能真正持久地富裕呢?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的我国,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我们每一个公民,包括每一个农民,都应该享有上述种种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同时也必须恰尽他对国家、对集体、对其他人应尽的一切义务和责



任。这些义务和责任都由宪法、法律和各项规程所规定的。它们是确保人民享有多项民主权利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说，宪法和法令规定，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义务，都有维护社会主义和秩序的义务，农村社员都有交纳公粮的义务。我们的企业和机关都规定每个职工都必须完成的职责。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都不能很好地履行上述义务和职责，那么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会肆意侵略我国，我们的社会就会动荡混乱，我们都会没有饭吃，我们的生产和工作就全部停摆。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实现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吗？所以，我们每个公民，每个农民都必须确立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相统一观念，在享受我们应享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必须很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一切义务和职责。这种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赋予的权利，这种义务和责任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义务和责任。

在以上述中心思想为内容的集中指导下，不断加强密切结合实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农民觉悟程度日益提高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民主就会逐步得到充分的发挥，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大搞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前景肯定是十分光辉灿烂的。



封面设计：王师颀

## 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

Shijie jingji Yu Zhong guo jingji

钱俊瑞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十一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53,000 字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书号 4001·453 定价 0.65 元